上海旧话

郑逸梅 徐卓呆 编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旧话

郑逸梅 徐卓呆 编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72170

上海文化出版社

1072170

责任编辑：邓忠谋
封面设计：蔡则仁

上 海 旧 话　　郑逸梅 徐卓呆 编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25 插页 6 字数 84,000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书 号：17077·3018　　定 价：0.96元

前　言

上海是一个工商业繁荣和文化教育发达的大都市。各地来上海作学术交流及采购游览的，络绎不绝。住居上海的，当然很需要知道一些本地风光；外地来客，也想了解一下上海的沿革和变迁。现在的情况，举目可睹，至于过去，那就得依靠书本的记载了。但上海的形形色色，是错综复杂的，能作系统介绍的书，寥若晨星。直到一九五六年春，上海文化出版社有鉴于此，拟订了一个地方性掌故丛书的出版计划，总称《上海旧话》。那么既称旧话，非得由身历其境、闻见广博的老上海来执笔不可。出版社便找到了我和徐卓呆。我们两人，为数十年老友，又都是由苏州移家上海，度过了半个世纪，那就责无旁贷，勉为其难地担任下来。卓呆参加过话剧、京剧和连环剧的活动，他生肖属羊，自称"羊老伶公"，戏剧是熟门熟路的。我平素注意社会掌故，因此我们拼成双档，卓呆写了一本主要关于戏剧的——《上海旧话》(一)，我写了一本主要关于交通的——《上海旧话》(二)，总算进行顺利，就在这年秋间出版问世。当撰写时，卓呆却存着顾虑，深恐涉及同行，无意中得罪了人，乃取笔名"赫马"。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径署郑逸梅。这两

本书既出版，正预备续有所作，我们又分了工，卓呆写社团帮会，我写书画艺术。不料反右运动开始，计划无形中断了。

光阴如梭，转瞬已经三十个年头，已出版的两本《上海旧话》，当时印数不多，早已难于访觅，抱向隅之叹的大有人在。况近来对于上海史料的探讨，成为一时风尚。大家不约而同地希望多刊印一些这方面的书，便按出版社意见，略作文字和年月上的修改，并为一册，加了照片，又重新和读者见面了。

郑逸梅

一九八六年一月

目　次

·上　编·

从羊角车到轿子……1
马车的流行……6
四明巨商周湘云的第一号汽车……11
第一次通行电车……15
人力车的由来……20
三轮车和脚踏车……23
市虎杀人……25
沙船的起始……28
招商局轮船和外商轮船的竞争……30
摇舢舨发迹的叶澄衷……33
具有神力的万篙头……35
一件撞船惨案……37
淞沪铁路拆而又建……39
五卅事件发生在大马路上……41
静安寺路的静安古刹……46
中国的华尔街——二马路……53
三马路的新闻报馆……55
四马路的青莲阁……59
戏院密集的五马路……63
一称报馆街的望平街……64

DC34/3

新闸路的辛家花园……66
双清别墅……68

·下　编·

戏园为什么称茶园？……69
传唱堂戏的苛政……73
《大三上吊》的惨祸……76
人间地狱话"群仙"……78
戏园中的隐名资本家……83
妓女与洋人喝的绿茶碗……88
小叫天的倒彩风潮……90
消灭了九龙口……94
大快人心孙悟空……98
什么叫做"文明戏"？…… 102
上海第一家游戏场——楼外楼… 105
新世界的产生…… 111
大世界后来居上…… 113
新世界急起直追…… 116
花花"世界"风起云涌…… 119
黄磋玖的破产…… 121
最初的电影院和电影公司…… 126
连环戏…… 128
上海最早的女说书…… 129
上海的说书业…… 131

上　编

从羊角车到轿子

数十年前的上海，除了水道用船，陆路的代步品只有两种：一种是平民化的小车，俗称"江北车"，又称"羊角车"，是独轮的。这种车子必须两边坐人，取得平衡，否则要倾翻的，并且轮外裹着铁皮，走在石子路上颠簸得厉害，坐的人很是累乏，所以官绅富商们跟这种车子无缘。小车又可以载货，但租界章程规定，从早晨八点起至晚上八点止，这种载货的车子不准在闹市区通行，这是很不方便的。一八九七年秋间，租界上的小车夫因工部局议加月捐八百文，便聚众罢工，会合在黄浦滩总会门前，预备请愿。不料马巡（骑马的巡警）前来驱散，小车夫等不服，群起反抗。马巡急吹警笛，不多时中、西捕闻声赶来，举起棍棒乱打。小车夫等大怒，越聚越多，拉断一家洋行的铁栏杆作为战具。总会西人知道形势不对，立即电话通知捕房，捕房鸣钟告警，召集寓沪各团练和各马队炮队，先在捕房四周架炮，保卫了工部

局，然后分头出发弹压。停泊浦江中的兵舰放空炮四响，舰卒排队登岸，小车夫被逼退却。后经中西官方设法调停，取消加捐成议，才各复工。但是西人对于工部局的这次措施大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屈服于武力，是对中国人的让步，使白种人的尊严大大地受到了打击。《点石斋画报》中何元俊所绘"大闹洋场"，便是这件事的写实。

另一种是贵族化的轿子。轿子一称"肩舆"，是雇人抬着走的。因为坐轿者的身分不同，分为两人抬的、三人抬的、四人抬的以及八抬八杠的好几种。那上面的轿顶也有区别，有锡的，有朱漆的，有金色的。八抬八杠的金顶绿呢大轿，要地方上最阔的官员才得乘坐。当时如吕海寰、袁树勋、瑞澂、刘燕翼等上海道台就坐着这种轿子，显赫地在街上往来。知县官如吴馨、沈宝昌、危道丰等，只能坐四人抬的朱顶蓝呢轿子，不敢和道台并驾齐驱。没有官衔的，坐两人抬的蓝呢轿，称为"小轿"。因此有财有势的公馆中都有轿厅，停着轿子，长雇着轿夫，随时可以乘坐。

妇女所乘的轿较为精致，样式也较小，轿帘有须头缨络，掩映飘拂着。天冷的时候，帘帷是用银鼠、灰鼠等皮毛做的。逢到喜庆应酬和新正拜年，妇女穿着披风红裙，满头的珍珠翡翠，更非坐轿不可。至于新娘坐的"花轿"，那是绣着"凤穿牡丹""福禄鸳鸯"等吉祥花式的。也有用朱漆描金的木架轿子，悬挂着花灯和响铃，四面遮蔽的"四明彩轿"。这种轿子起初只是宁波人家用，宁波人流寓上海的很多，"四明彩轿"渐渐流行，人家也都采用了。丧家的妇女，出殡坐着"丧轿"，"丧轿"的顶上蒙着白布，有全蒙的，有半蒙的，这

是由坐者孝服的轻重来区别的，就是重的全蒙，轻的半蒙。又，送丧女客所坐的称为"客轿"，这些都是两人抬的。此外供神主牌位的轿子，称为"魂轿"，形式就比较大了。

医生出诊，坐三个人抬的轿子。所谓三个人，其实只有两个人，另一个人是替肩的。抬走时稳健如飞，即使替肩换手也很轻捷，不稍停止。原来诊病的人家多，更有拔号的，不得不如此。也有并无病家请诊，故意乘轿兜圈子，表示是"时髦郎中"。人家瞧他出诊多，似乎经验丰富，患了病也就请他来诊治了。这是旧社会虚伪造成的一种怪现象，说起来是不值一笑的。直到后来，马车代替了轿子，汽车又代替了马车，名医出诊，就改乘马车和汽车。可是伤寒专家张云骧（他是个聋子，人家叫他张聋聋，后来他也自称张龙朋了），他却仍旧坐着轿子。张云骧故世后，他的后人把这顶轿子吊在门房里，作为纪念。

轿子是当时上层人物表示"有身份"而坐的，但也有例外，如死囚押赴刑场，有用囚车的，也有坐轿子的。不过，这种轿子没有轿顶。妓女应征出堂差，坐着"飞轿"（轻快的意思），晚上轿后挂着"××书寓"的明灯，在四马路小花园一带，大出风头。那时上海红得发紫的妓女有四个，即林黛玉、金小宝、张书玉、陆兰芬。她们每天必到张园"安凯第"茶厅口各据一桌，招呼熟客。那别号叫"南亭亭长"的李伯元，称她们为"四大金刚"，在他所编的《游戏报》上一再提到，因此"四大金刚"的名称，轰动当时社会。陆兰芬本姓胡，名月娥，在"四大金刚"中模样最为漂亮，西洋人见了，替她拍照，铸版登在西报上，称她为"支那美妇人"。这样的红

妓女，堂差应接不暇，当然非坐轿子不可。后来妓女坐轿子风行一时，也成为普遍的事了。可是租界当局看到这种情况，便大加轿捐，倍数很不合理，一般操卖笑生涯的，敢怒而不敢言，只得忍痛缴纳。陆兰芬却大不赞成，提倡不坐轿，作消极抵抗。逢到清倌人（即年幼妓女）出堂差，由妓院中的工役掮在肩头上，起初觉得颤巍巍地很触目，渐渐看惯也就不觉得怎样了。这个例子一开，大家纷纷效法。这样只须一个工役，肩头掮着人，手里提着弦索，可以省掉两三个轿夫，妓女的轿子顿时绝迹。租界当局弄巧成拙，反而大大地减少了原有捐项的收入。经过相当时期，那三弯头的钢丝包车盛行起来，妓女出堂差便改坐包车了。

关于轿子，尚有一段小小掌故，那就是杨子京雇西人抬轿，也是值得一谈的。原来上海的市面，从前只限于所谓"洋场十里"，没有现在这样的广大。那"洋场十里"，特别以四马路一带为热闹中心区，所以《吴友如画宝》中所绘的"青莲阁""小广寒"都是四马路的景色。向西过了大新街，直到小花园，那儿叫做"胡家宅"，有"第一台"和"群仙茶园"（那时京戏院都叫茶园），"群仙"是演髦儿戏的首创第一家。又袁翔甫的"杨柳楼台"也在这里。那"胡家宅"是杭州大富商胡雪岩的产业，胡雪岩在该处设有临时公馆。后来胡雪岩经营丝业失败，便把胡家宅一带的房产卖给姓杨的，姓杨的儿子名叫子京，靠着祖上剥削来的资产，过那豪华奢侈的生活。但是他却看不惯外国人在租界上耀武扬威，任意辱打中国人，我国的官吏只知媚外，无论什么事，外国人总占上风，他就想弄些玩意儿来出这一口恶气。有一天，他招了个

裁缝来，要做一件长衫。裁缝替他量尺寸，他说尺寸不必量，做一丈八尺长便可。裁缝大为惊奇，说："从没有听到过有这样长的长衫，就是做了，拖着地怎能举步行走呢？"他说："用不到你替我顾虑，你这样做就是了。"裁缝知道他脾气很坏，不好违拗他，便喏喏连声地答应着，可是暗地里却不免好笑，以为这样长的长衫，除了龙华寺门前的四大金刚，谁有这样的身材啊！后来长衫做好了，杨子京非常满意，给了加倍的工资。一面叫他的仆人到外边去找四个外国瘪三来侍候，许他们重酬。那些外国瘪三当然很高兴，听凭他指挥。他就把这件特制的长衫穿在身上，命四个外国瘪三每人提着长衫下摆的一角，大模大样地在四马路一带兜圈子。四个外国瘪三或前或后，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两旁行人都看得呆了。他这样还不算，过了一天，他又穿了这件长衫到城里豫园湖心亭喝茶，坐着官派十足的绿呢大轿，仍旧由那四个外国瘪三抬着。外国瘪三抬轿子是门外汉，抬抬停停，停停抬抬，走得很慢。到了豫园下轿，外国瘪三又替他提着衣角，宛如做了一出滑稽戏，看热闹的把马路都塞住了。

轿子本是公馆人家自己备来代步的，后来变成可以随时雇唤，成为一种行业了。因此轮船码头和火车站一带，总是停着很多轿子，兜揽生意，但都是两人抬的小轿，绿呢大轿只是专供官绅富商使用的。

马车的流行

替代轿子的是马车。马车比旧式骡车精致得多，是从外国流传到我国来的，所以最初坐马车的大都是西人。原来在京城里有一种类似的四轮马车，是皇家的御用品。直到清末，除了一二品红顶花翎的大官外，其他官员尚都不敢乘坐四轮马车，后来风气渐渐转变，一班富商大贾都纷纷自备四轮马车，堂皇据坐，也就无所谓了。第一个坐马车的，便是在上海做寓公的钱塘人程定夷。他是个收藏家，一号听彝。接着坐的，有江建霞、沈淇泉两位太史公。他们很穷，但为摆阔起见，却认为非马车进出不可，否则有失身份。当时有人开玩笑地做了一首打油诗："阔得如此穷，穷得如此阔，江浙两翰林，江三沈十一。"原来江排行第三，沈排行第十一。但无论如何，马车在十里洋场上行驶，仍受到限制的。就是西人的马车在先，华人的马车不能急起直追，超越西人马车就是违章，由巡捕抄了号码去，要受罚款的处分。西人气焰之盛，真是不可一世。西人看到前清官员都是头戴缨帽，身穿箭衣，他们就把缨帽箭衣作为马车夫的制服，只是没有顶珠，无非借此取笑侮辱罢了。可是日子一久，也就司空见惯，即使清朝官员的马车，那车夫穿的也是这种带有侮辱性的服装，把它作为定型了。如任新衙门会审官的

满族人宝子观，他的马车夫穿着玫瑰紫色的箭衣，用黄绸镶边，头上缨帽也是玫瑰紫色的，缨儿是黄的，和箭衣取得一致。脚上更穿着高统靴，表示威武，真是恬不知耻了。

马车也有双轮的。这种双轮马车较为精致，且属小型，译音叫"亨斯美"。寻常的马车，车轮是铁的，唯有这一种却是橡皮轮，非常轻便，前面往往驾着阿拉伯种的高头骏马，马身上披着锦毯，头上戴着小笠，笠上有两个孔，把马耳露在外面。那些王孙公子自己控着丝缰，旁坐绝色的女郎，在绿荫夹道的静安寺路上向西驶到张园、愚园去兜个圈子，他们认为这是唯一出风头的事。尤其英商欧爱司·哈同的朱漆双轮马车，招摇过市，更是引人注目。

"亨斯美"大都敞篷，适用于春秋时节。四轮马车有敞篷的，也有轿子式的。轿子式的叫"轿车"，车中设备很完美，配着晶莹的玻璃窗，外加浅碧色的窗帷，两旁且有插绢花的瓷瓶。天寒便在坐垫上覆着狐皮毯子，虽然外面风雪交加，但乘坐的人一些不受影响。只是到了热天，乘着轿车太觉气闷，不如敞篷的通风舒畅。还有一种既非轿车，又非篷车，却是上面张着车盖，由车后铁柱支撑着的，形式较为简单。所以那时凡属公馆人家，都有一间马车间，为停车蓄马之所。

马车有单马的，也有双马的。双马并驾齐驱，较单马的快得多，公共租界火政处的救火车，都是双马并驾的。官场也有用双马的，如民国初年，袁世凯窃国称帝，派郑汝成任上海镇守使，想镇压革命。郑汝成气派十足，常用双马马车代步。有一次，他去日本领事馆庆祝他们的节日，双马马车

经过外白渡桥，被人狙击，这位镇守使顿时毙命。

公馆人家的自备马车，须雇佣马车夫。那些马车夫锦衣窄袖，很多俊美人物，因此姨太太勾搭马车夫闹成风流案件的，时有所闻。后来市上开设了许多马车行，供客雇唤，也可包租全月或全日。全月轿车六十元，篷车五十元，全日五元。那时的马车行，比较著名的有北河南路的"公大"、云南路的"公和"、北山西路的"协大"、海宁路的"时发"、威海卫路的"发来"、北浙江路的"杨协兴"，尤其以白克路派克路口（今国际饭店东面）的"龙飞"规模最大。马车既多，那些马车夫和公馆人家所雇佣的马车夫便成为一个大集团，由帮会流氓掌握着，和租界捕房的包探通着声气，敲竹杠，污辱妇女，简直无所不为。此中也有所谓"四大金刚"的，这"四大金刚"都有诨号，诨号叫惯了，真姓名反而不用了。一个叫"火烧木头"，原来他黑而瘦长，外面却很有声势；一个叫"跑龙套"，或许是在戏馆里做过起码角色的；一个叫"癞葆生"，他头发光秃，对于任何一家马车行都熟悉，时常为阔人驾御车辆，关外马贩来，都由癞葆生招待鉴别，他不但善相马，且擅控骑；一个叫"老升和"，那些长三堂子的妓女，往往和他有点关系。总之这些马车夫十九有白相人气派，如遇相打，他们一呼百应。人家怕他们的恶势力，奈何他们不得。

每年暮春三月，马车便大赚其钱，因为一般游春仕女，大都雇着马车到龙华去看桃花。实际在龙华寺一带是看不见桃花的，必须深入农村，才有殷红灼灼的桃花掩映在田陇篱落间。坐马车来的游客，决不到那儿的，于是就有村女折

取了成束的桃枝来镇上求售，游客往往买些带回去，无非聊以应景罢了。

现在的人民公园，从前是西人的赛马场，俗称跑马厅，占地四百数十亩，都是华人的田产，硬被西人圈了去的。每年春秋两季，各举行大赛马一次。赛马总是在下午举行，所以各银行、洋行，往往按例停止办公半天，星期六决赛跳浜，那更轰动一时。赛马场四周，只有短栅没有墙垣的，因此就有一些人备着长凳，专供人们站在上面观看，每人取费铜圆两三枚。这时规模较大的马车行，把马匹结着彩绸，鞭子上也缀着红缨，称为跑马汛赶生意。那些大少爷们拥着娇妻美妾，乘着这种漂亮的马车，在赛马场外面大兜圈子，去而又来，来而又去。原来坐在车上看赛马，比购票入场还要舒畅，虽车资加倍，也在所不惜。

谈到坐马车看赛马，却有那么一段故事。那时有一位阔少爷，仗着他父亲剥削得来的资财，终年过着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某次春季大赛马，他就命当差的去雇结着彩绸的马车，预备挟着姨太太去看赛马。岂知时间迟了些，马车行的车子被雇一空，遍问几家马车行，都是如此。他就大发脾气，立刻向各马车行预订明天所有的马车。原来赛马连赛三天，到了第二天，他和姨太太大模大样地同坐一车，其他所雇的马车，都空着跟在后面兜圈子，算是发泄前一天雇不到马车的余恨。这样无谓的斗意气，充分暴露出资产阶级的恶劣行为，旧社会里的怪现象，真是层出不穷。

新年里兜喜神方，这是妓院里的习俗，兜喜神方也是乘马车的。这时，红妓女打扮得花枝招展，珠翠满头，盈盈地

坐在车上，在四马路一带走马灯似地兜圈子。因为四马路是全市最热闹的所在，所以把它作为中心地点，那马车总是由望平街兜到三马路，再由石路转弯，又到四马路。一班轻薄少年，往往在四马路的茶馆沿阳台泡壶茶，预先买了许多金钱纸炮，等到马车驶过，纷纷抛下金钱纸炮来，噼啪作响，吓得那些妓女们连忙把轻红浅碧的手帕遮着头面。这种恶作剧，不久被禁止了。

还有一些破旧的马车，专门在马路上招揽生意，称为野鸡马车。如十六铺到大新街的马车，大都停在大有水果行门前。这家水果行是商团司令江一南开的，江一南和革命党人有秘密往来，那些炸弹往往藏置在成束的甘蔗中。只因那地方马车来往，异常嘈杂，借此掩护，也极便当。又三茅阁桥堍，也多这种马车，无非供一般劳动人民乘坐，车资一般只要铜圆两三枚，十分公道。每车乘坐四客，先上车的，必须等满了四客才得开行。在一九三七年，据有关当局调查，这种马车只剩下八辆，以后便完全淘汰了。

四明巨商周湘云的第一号汽车

汽车自西洋运到上海，始于光绪二十七年，当时只有两辆，由匈牙利人黎恒时输入，柏医生（当时的西洋医生）首先试用，租界当局列为马车之类征税，大家把它看做新奇的东西。直到民国元年，才增至一千四百辆。汽车须捐照会，第一号照会为四明巨商周湘云所得，那时西人主持的工部局把这第一号照会居为奇货，周湘云志在必得，便被工部局方面敲了一笔大大的竹杠，花了很多的代价才得到手，周湘云因此引以自豪。那时司机也须有执照，哈同的司机执照为第一号，因此很想用第一号司机驾驶第一号汽车，成为珠联璧合，为此曾和周湘云协商，请他相让，可是周湘云坚不答应。哈同靠了英国的势力，特地雇用了大批流氓，预备等第一号车出来，一拥而上夺取照会，最多罚款了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结果这消息被周湘云获悉，把这第一号汽车终年锁在汽车间里，不再驶出。后来绑票风气大盛，一号汽车太引人注意，越发不敢乘坐了。

周湘云虽有第一号汽车，但第一个坐汽车的，却是叶少吾。叶少吾是杭州名士叶浩吾的儿子，此人一贯在上海逛妓院，浩吾知道了，责他："如此浪荡，成何体统！"他就以"浪荡男儿"自号，著有《上海之维新党》《商界鬼蜮记》两部遭责

性的小说。后又任《中外日报》编辑。这时坐汽车的都是外国人，他却借着外国人的汽车出门拜客，驶过热闹市区，大家都很注意他。

过了一个时期，才有出差（租）汽车，照会号码是白底黑字（自备车照会是黑底白字），取费分三种：一以时间计，二以行程计，三以包半天或全天计。除车资外，须酌给小账，称为酒钱，如二十分钟车资为一元，小账须给二角。较著名的汽车公司有"云飞"、"祥生"，祥生汽车公司为了取得40000电话号码，使雇车者容易记住，有利营业，也花了一笔很大的运动费。后来有一位早期留学生、某大学教授李松泉开设利利汽车公司，结果以不善经营，折本停歇，继起者有银色汽车公司，和"云飞"、"祥生"鼎足而三。

汽车既代马车，于是嫁娶送丧以及火政处救火，都用汽车，渐至红妓女出堂差，也以自备汽车表示阔绰。但租界章程，驾驶汽车仍和马车一样，西人的汽车在前，华人的汽车不能急起直追，超越了就要罚款。这时却有一位绰号"小抖乱"的叶仲芳，是叶澄衷的孙子，他对此大为不服，有一天故意驾着汽车在南京路上疾驶，不管前面有没有西人的汽车，超越了再说。他自己又手执一个鸡毛帚，看见巡查的西捕，就在他头上抽击一下，结果被抄号码，罚了一笔巨款。这种行径，虽不足为训，但处于帝国主义者压迫欺侮之下的中国人，怀着满腔反抗的心情，最后表现在行动上，这一点还是应加肯定的。

装运货物的汽车，称为卡车，较大的工厂和商店都自备卡车，不但装货，且可载人。一二八事变时，有一驾驶卡车

的工人胡阿毛，忽地连车带人被日军抓了去，强迫他装运军火，由日军监押着开向前线。他非但不惊惶，反而满脸堆笑，显出很高兴的样子。日军当然毫不怀疑他，岂知卡车开到外滩，就直冲到黄浦江中去，于是车上所有军火和日军同归于尽，他自己也壮烈牺牲了。

抗日战争结束后，由于蒋介石集团的媚外，美国的军用吉普卡在市上横冲直撞地乱开。他们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是脱不了醇酒美人的，往往在车上挟着年轻的姑娘，招摇过市，这些姑娘人称“吉普女郎”。他们故意寻开心，不是把行路的人撞死，便是把其他车辆撞翻，也不当一回事。再说我们已往的交通车辆是向左开门的，而吉普车是向右开门，为了防止左右相歧，减少更多冲突，结果我们只得把所有的汽车、电车一律改向右边开门，可是出乱子的消息，报上还是天天有的。

最初，公共汽车公司共有四家，即市办公共汽车、华商公共汽车、英商公共汽车、法商公共汽车。英商的备有楼座，成为双层汽车。可是这种汽车车厢过高，不易保持平衡，在打弯转折时，几次翻车，死伤了很多人，后来便把楼座取消。抗战时期，除法商公共汽车勉强维持原状外，其余都被敌伪强行合并为上海都市交通公司。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这年九月十九日，由公用局派员会同英商公共汽车公司代表前往接收，暂由该局派员维持业务。十月间，英商部分即分别交还原经办人继续经营。市办及华商部分却已完全消失。

从公共汽车发展为长途汽车，最早的要算沪闵南柘长

途汽车公司，尚在一九二〇年，由邑人李显谟、黄申锡等发起。记得李右之的《上海见闻纪事诗》中有那么一首："汽车沪闵筑长途，创办邑人李显谟，一小时中全路达，交通便利是良图。"所谓"沪闵南柘"，就是由上海南市到闵行，过黄浦，经奉贤县的南桥，到达柘林，总公司设在沪杭甬铁路公司北面，分办事处在闵行。一九二一年邑人穆湘瑶和南汇朱祥绂办上南长途汽车公司。同时黄炎培等邀同上海浦东塘工善后局局董朱日宣办上川长途汽车公司，在抗战时期，都被日寇破坏。

第一次通行电车

电车的通行，尚在汽车之前，起初是有轨的，《上海研究资料》有这么一段记载："第一次公共租界有轨电车通车于一九〇八年三月五日（清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三日）。无轨电车通车于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十一月。公共汽车通车于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十月九日。双层公共汽车行驶于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四月一日。第一次法租界有轨电车通车于一九〇八年二月（清光绪三十四年正月）。无轨电车通车于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八月一日。公共汽车通车于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二月一日。第一次南市有轨电车通车于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八月十一日。公共汽车通车于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十月十日。第一次闸北公共汽车通车于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上海县志》也有一段记载："公共租界电车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三月五日开办。一自静安寺路至公园靶子场，一自十六铺至卡德路，一自东新桥至麦根路，一自西门至沪宁车站，一自沪宁车站至外白渡桥，一自沪宁车站至提篮桥，一自杨树浦至十六铺，一自洋布局至十六铺，一自提篮桥至十六铺，一自外洋泾桥至靶子场，一自三洋泾桥至北泥城桥。（原注：路线时有变更，此据民国十年调查。）法租界

1072170

电车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开驶，一自十六铺至徐家汇，一自小东门至西门，一自西门至沪宁车站。公司在卢家湾北首，电车出厂一往南行经斜桥西门，一往北行经吕班路霞飞路。无轨电车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秋开驶后，因路未坚实，暂行停驶。次年七月复开一端，在洋泾浜设有转车盘，自能将车转回，一设在老闸路南境。”《上海县志》所载通车时日和《上海研究资料》显然是不相符的。据我所知，宣统之前已有电车，《上海研究资料》所载较为正确。并且西门至沪宁车站不能直接通车，到东新桥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交界处必须换车。后来虽把路轨接通可以直达，但车票还是分两起卖的。

又据我所知，公共租界通行电车在法租界之前，那么《上海研究资料》所载是有问题的。第一次通行，从静安寺起，开到外滩止，乘坐的共二十四人，如朱葆三、虞洽卿辈，有一半是西人，两旁观看的人很多，且有带了照相机拍照的。原来电车初办，有“不能乘坐，坐了容易触电”的谣传，所以西人特地试给人看，表示乘坐电车毫无危险。后来更在车厢外面标着“大众可坐，稳快价廉”字样(从静安寺到外滩车资只须两个铜圆)，借此号召。直到一九一四年，有轨电车不够普遍，铺铁轨又太不经济，所以有无轨电车的出现，把路线也放长了。同时有轨电车也加一节拖车，称为三等车。电车之有头等三等，没有二等，是因他们西人自认为应当乘头等车，而我们中国人比他们相差不止一级，只能乘三等车，这种等级分得何等荒谬！

当有轨电车初行时，有一位安徽歙县的名士王锺麒(号

无生，又署天僇生，著有《恨海鹃声谱》，后加入南社），他很反对电车，在《神州日报》上撰写社论，痛骂西人搜刮金钱，断绝我们一般人力车夫的生计。不料这样一来，触怒了西人，派了警探四出捉拿他。王锺麒在上海不能立足，避到他第二故乡扬州去。他心里很是气愤，做了两首诗寄给上海的朋友。第一首是："网罗遍地将焉适，披发归来未可嗟，多难只缘文作祟，忧天拚会骨埋沙。有灵欲奏通天表，无地能容泛海槎，四海知交君最厚，可能为我作朱家。"第二首是："已由亡命成张俭①，拚把缣囊待杜根②，落落不辞头可断，云云应悔舌犹存！敢因风浪违初志，欲驾云霓叩九阍，多少名流同一叹，更无人与作昆仑！"西人气焰之盛，读了这两首诗不难体会。

电车初行时，车上没有铁栅拦护，因乘客寥寥，也没有人敢在车行时跳上车。后来乘车的人拥挤，加添拖车，才装上铁栅。战前华界及法租界、公共租界共有二十八线，战时因交通阻塞，递减至十二线。所有华商电车的路轨都被日寇拆卸，由海舶装到日本，就是公共租界的电车，车上一切铜拉手也都被日寇拆去，改为木制。这种行径是何等卑鄙可耻啊！

抗战时期，日寇尚没有进入租界，吴淞江便是天然的界限。吴淞江以北，本属华界，敌机大肆轰炸。后来我方军队

---

① 张俭　东汉高平人。最初任东部督邮，疏劾中官侯览不轨，侯览大怒，诬他结党，张俭逃走。望门投止，人们都敬重他，愿意冒险收容。

② 杜根　后汉人。任郎中。邓太后临朝，权落外戚之手，杜根上疏直谏归政。太后大怒，把杜根拘捕，装在缣囊里，在殿上将他扑杀，幸未死，逃酒家为佣保。

向西撤移，敌军更焚烧屠杀，顿使繁荣的市面化为灰烬。这时十六路电车所经路线，是沿着吴淞江的，乘客靠窗北望，瞧见这种惨状，真欲伤心掉泪。常州胡君复（中华书局《辞海》编辑，又有《胡氏联选》，风行一时），住在沪西澳门路，他出外绝对不乘十六路电车，认为车经吴淞江边，望见荒烟蔓草，败墙断壁，为之触目惊心，要好多天睡不着，吃不下。那位老人家的爱国热忱，真是可敬可佩。当时日机投弹，目标总在吴淞江北，但有一次投偏了，落在吴淞江南，十六路某号车中着一弹，死了很多乘客，车辆也被焚毁。后来才把路线改走康脑脱路（今康定路）和武定路。直到现在，仍按着这条新路线行驶。

敌伪时期，市上缺乏分币，电车票改收邮票，邮票稍有污损便不能用，于是在邮票外面包上一层蜡纸，互相找兑，以保持整洁。一度也曾用公共汽车上的镍制代价币购票。后又因市上缺乏小额币，以致卖票的只收整数之券，余数概不找付，时常引起争执。结果不问路途远近，一律定为储备票五百元。公司为避免卖票员作弊，在站头设售票亭，不向售票亭买票的，不得上车。下车时又不得以票子送给卖票员。规定积得废票若干可换取奖券，中奖的可得月季票。为了防止卖票员揩油，又雇用了查票员，日子一久又有弊端，于是由高级查票的西人来查查票员。其时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电车工人时常罢工，一罢就是一星期甚至十天，致买月季票的乘客大吃其亏，不得不向公司办交涉。公司又为了节电，早晚通车，中午停驶。形形色色，如今都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日寇入租界后，操纵着一切，每逢开月的第一天，报上照例登着一大片触目的涨价广告，特别是公用事业，更带头涨价。电车月季票本是三个月一计算的，因每月有大变动，便改为一个月一计算。而且这种月季票买来等于白买，因为日寇时常作封锁演习，电车在封锁线内不能行驶，封锁半天或一二小时，没有一定。有时某区开放了，某区尚在封锁中，弄得进退维谷，无法可施。有时地方上出了乱子，就把这一区封锁若干天，连人带车一起封锁在内，乘客们在这几天内只得睡在车厢中，作为临时公寓。即使不封锁，晚上灯火管制，电车很早就进厂，买了月季票，仍得摸黑步行回去。逢到天雨，那更拖泥带水，狼狈不堪。

人力车的由来

上海第一次有人力车是在一八七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清同治十三年二月初七日），法国人米拉从日本输入了这种车辆，经法租界公董局核准，便在三月二十四日发出第一张照会。米拉后得法公董局和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许可，备车三百辆，在租界以内营业。但他经营了两年，却大大地蚀了本，结果逃到海参崴去。因为这种车辆是从日本来的，所以大家叫它"东洋车"。据说最初拉车的都是日本人，由于言语的隔阂，时常发生误会，才由本地人来拉。因为车夫在前，用着腕力拉走，又称"腕车"。当初的人力车，两轮高大，与马车后轮差不多。轮是木制的，外裹铁圈，行时辘辘作响，震动得很厉害。车座也较大，可坐两人。后因男女并坐，有苟且之事发生，捕房认为有碍风化，严行取缔，改小车身，只容一人。且以木轮铁圈，行走损坏马路，工部局亦加干涉，才改用橡皮轮，行时较为平稳。这种车的车座都漆黄色，故又称为"黄包车"。后来泥城桥堍日通公司发明钢丝胶皮轮三弯式车，那就是老舍在《骆驼祥子》一书中所描写的"弓子软得颤悠颤悠，连车把都微微地动弹。铜活地道，雨布大帘，双灯、细脖大铜喇叭"那一种车。但中国人因价贵不坐，所以专揽洋人生意。可是这种车行走时没有声

响，车夫不先警告，常有冲撞行人之事发生。工部局曾一度禁止，直到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钢丝橡皮车才通行全市。

人力车夫所拉的车子，大都是向车行租来的，上海大大小小的车行，如永隆公司、亨利公司等有数千家之多，有的备着数辆，有的备着数十辆，且兼修理。有的车夫自己积蓄了些钱，买一辆半新旧的车子，捐一张照会，车座油漆一新，比较整洁漂亮，到处兜揽生意，那便是"野鸡包车"。

全市人力车辆数很多，在租界时代，工部局西人认为捐照会是一笔极大的收入。但这样尚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便想尽方法再来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人力车夫在马路旁边兜揽生意稍一停留，或拉着乘客到了目的地停车，等待付给车资，巡捕就认为这是违反交通章程，把照会硬行取去，称为"撬照会"。车夫向他们苦苦哀求，甚至叩头下拜，巡捕非但不表同情，反把他拳打脚踢。原来这是工部局西人对我国劳动人民的政策，巡捕不过奉行惟谨罢了。人力车夫的照会被撬了，必须再捐一张。这样，车夫辛辛苦苦赚来的一些钱，预备回去籴米买柴，一家老小靠此生活的，完全落了空，而工部局却除了正式照会捐收入外，又多添了许多额外的照会捐。

西人乘坐人力车，气派十足，往往不讲价钱，也不说明到哪儿，便高坐在上面，手里拿了一根手杖，要车夫向左转弯，他只用手杖在车夫左背触一下，向右转弯，便在右背上触一下。到了目的地，把脚一蹬，就得停下，车钱由他随便给，给得太少，车夫向他再要一些，他便拳打脚踢，有时一巴

掌打得车夫牙齿出血，车夫只得忍气吞声，自认晦气。

抗战结束后，上海充满着美国人的势力。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有美国海军水手赖令奈乘坐臧大咬子的黄包车，下车后不付车资，臧大咬子立在门口等候。不久赖令奈和另一美水兵饶德立克外出，臧大咬子讨钱不着，就上前拉他的手，不料饶德立克忽然举拳猛击臧大咬子胸部，臧受伤很重，经送仁济医院急救无效，到第二天就死了。这暴行发生后轰动全市，引起各界公愤。其后虽经审讯，但因国民党反动派媚外，结果该凶犯仍逍遥法外，臧大咬子白白地丧失了性命。

拉人力车的劳动人民，本质大都是善良的，如鲁迅先生在北京时所写的《一件小事》，便是写一个人力车夫自认带倒了一个老妇人，他没有听从乘客叫他管自赶路，却搀扶着那老妇人到巡警分驻所去。作者通过这样一个故事，表现了劳动人民的诚实和正直。但从前的上海，终究是个万恶的渊薮，人力车夫中也有沾染恶习惯的，他们往往欺生客和敲竹杠。尤其逢到下雨天，如乘客没带雨具，雇车代步，那车夫就漫天讨价，使人啼笑不得。

但人力车究竟是落后的交通工具，后来就逐渐地淘汰了。解放前夕，尚有五千多辆，七千多人力车夫。人民政府有计划地帮助他们分批转业，训练成为汽车驾驶员或技术工人，有的参加农业生产，直到一九五六年，上海有关交通单位把最后的两辆人力车送进博物馆陈列。人力车夫们举行庆祝会，感谢政府替他们挖掉穷根，帮助他们走上新的生活道路。

三轮车和脚踏车

三轮车的名称，在我国五代时已有了。如宋路振的《九国志》载着："林知元他所居住的地方，满栽着竹木，青枝绿叶，非常幽静，他驾了三轮车，在这中间随意玩赏。"这种三轮车，不知怎样的形式，因年代久远，现已无从查考。总之，决不是现在流行的三轮车，那是可以断定的。现在流行的三轮车，起始于敌伪时期，其时上海的汽油受着日军的统制，汽车不能行驶，三轮车便应运而生。起初只是在人力车前装上脚踏车，很觉不伦不类，后由一姓傅的加以改良，办了上海三轮车公司，车行设在派克路白克路转角国际饭店后面。但是那位姓傅的打小算盘，初次推行，只在新闻报上登着寥寥几行分栏广告，人家并不注意。所以第一天试车，虽是星期日，但知道的人很少，并不轰动。后来三轮车在南京路上驶过，人们也只是带着诧异的眼光，称其为两人合座的大黄包车罢了。

过了一段时期，人们都喜欢乘坐三轮车了。大家看到上海三轮车公司营业渐渐好起来，也就纷纷仿造。这种车行，几如雨后春笋，到处都是。有的把车座置在前面，车夫在后面踩踏，没有多久，觉得不顺溜，这种式样就废止了。

脚踏车，一名"自行车"，又称"自由车"，也是自西洋传

来的。最早的脚踏车，前轮特别高大，后轮较为矮小，式样和现今的不同。后因车轮大小不匀，行车容易发生危险，两轮就改为一般大小了。有燃汽油而用摩托发动的，称为机器脚踏车，必须纳捐。寻常的脚踏车起先可不领照，后来都要捐照会了。脚踏车分男女两式，不过当时女子驾驶脚踏车的很少，包天笑的《上海竹枝词》有那么一首诗道："香宾佳酿醉流霞，闲向天街蹋月华，夜静人稀归去也，倩郎扶上自由车。"原来女子驾驶脚踏车，人们争着观看，很觉羞人答答，往往于夜间才在空旷的马路上试驶着。

脚踏车竞赛，那时常有举行，十九以最快速的获锦标。但却有一次赛慢不赛快，谁最慢便是谁得奖。驶车过慢，易于倾倒，那就非有熟练技巧不可。那次最慢而得奖的，即创办神州国光社的顺德邓秋枚的弟弟秋马。我们看到秋马晚年耳聋目盲，老态龙钟，岂知他少年时代的腾挪矫健，犹如生龙活虎哩。

日寇侵华时，上海成为孤岛，食米大起恐慌。当时有一些小贩从乡村运米来沪，求得善价。倘日间被驻岗日军瞧见，米便要充公，甚至胡乱放枪，说不定中弹殒命，所以只得在黑夜偷运。力气大的，一辆脚踏车能载米二石五斗，这些小贩在敌伪时期生活困难到了极点，就不顾一切，拚命地干一下，那是值得同情的。

郊区一带，有以脚踏车后座载客的，取值较廉，生意也还不恶。但人在后座，容易摇晃，多少带些危险性，所以后来逐渐加以取缔了。

市虎杀人

上海的陆上交通车辆，已往租界当局只知一再加捐，对于掌握管理，简直漠不关心，因此车辆肇祸，时有所闻。尤其马车溜缰，那《点石斋画报》把它作为绘画的题材。在这种情况之下，不但坐车的遭殃，即路旁行人也有被撞倒受伤的危险。

自从汽车、机器脚踏车和三轮车的飞驰通衢，由于租界当局和国民党政府忽视安全，肇祸情况便更加严重，死于车轮下的不知凡几。寻常的人当然已不能记忆。兹举几位社会知名之士被车辆所辗死或撞伤的事，以见市虎杀人的暴烈。如侯官林亮奇，别号寒碧，他是南社诗人。早岁留学日本，归国时恰值武昌起义，他参加了革命工作，很有功绩。后来宋教仁任农林部长，聘他为秘书，一度为众议院议员，窃国大盗袁世凯猜忌他，他避居辽东，直到袁氏死后才南归，住在上海。民国五年八月七日，他赴友人之约，夜间外出，在马霍路被英国商人胡克明的汽车辗死。另一位是沈彭年，字商耆，游学归国，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后来从事教育，掌教上海正风文学院，文学院建图书馆，他是擅长书法的，便卖字以充经费。某年，他供职中国银行，有一天，他接得朋友邀饮的电话，匆匆乘黄包车赴约。行至旧法租界金神父

路口，突被某转运公司的运货汽车撞倒，身受重伤，由岗警车送广慈医院，救治不及，死于医院中。当时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径送同仁辅元堂验尸所，由所中人员在他马褂夹袋内觅得名片一张，才知他是中国银行的秘书。立即电告中国银行，再由行中转告他的家属，当时他的夫人已去世，由妻弟赵式谷去认尸，发现额旁有创伤，形似半月，深约一寸多，胸前衣襟上面都是血迹，两手也有伤痕，情状是很惨的。还有一位是上虞许泽斋，号啸天，他十九岁便在章太炎、邹容所主持的《苏报》上写稿，后加入了"光复会"，从事革命。章太炎给他几本翻译的剧本，如《黑暗时代之一线光明》《夜未央》《鸣不平》等，他读后引起了对于新剧的兴趣，便在《小说月报》《天铎报》《时事新报》上写剧本。那冯子和所演轰动一时的《血泪碑》，就是他编写的。他又和马相伯、王钟声等创办了"春阳社"，演《黑奴吁天录》，这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一出戏。他后来担任上海群学书社编辑，标点了黄梨洲、朱舜水、颜习斋、顾亭林、王船山等人的集子，以及《三国》《水浒》《红楼》《说唐》《列国》《今古奇观》《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小说，又编了一部《名言大辞典》。最著名的就是他所写的《清宫十三朝演义》，销数之广，为其他历史小说所不及。抗战时期，他带了一大批学生自沪内撤，步行若干省，好不容易到了桂林。一班热血青年都很爱戴他。抗战结束后回到上海，任诚明文学院教授，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经过外滩，被那无情的汽车辗在身上而枉死了。这辆汽车是两江公司的出差车，该公司的主人还是他的学生哩。又有名记者李浩然，自同孚路家中步行至威海卫路，预备乘电车赴新闻报

馆，岂知一辆机器脚踏车突然撞来，把他活活撞死。还有一位是南汇顾佛影，他工诗，有"大漠诗人"之号，又多女弟子，印有《红梵精舍女弟子集》，词也填得很好，朱古微很赏识他。淞沪沦陷，他绕道到了四川，直到胜利后才得东还，暂寓松江。当时报界前辈施济群中风逝世，一班报界朋友借青年会开追悼会。他和施济群友谊很深，便乘火车由松江到上海，不料那天下着雨，路上泥泞不堪，他一不留心被滑了一跤，正想撑起，忽一辆三轮车从横里驶来，把他胫骨辗断了。后来虽经伤科医治，总觉不良于行，影响身体健康，结果贫病而死。总之，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都因当初交通管理不善，做了轮下的牺牲者。

沙船的起始

水上交通，当然是依靠船只。关于上海的船只，据《正谊堂集》载："在上海，康熙间巨商张元隆多集匪类，广置洋船，立意要造船百只，以百家姓为号。"又《皇朝经世文编》也有那么一则："'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百余号。其号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的土著。每造一船，须银七八千两。其多者至一主有船四五十号，故名曰'船商'。自康熙二十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沙船'有会馆，立董事以总之。"到咸丰年间，沙船商王永盛、郁森盛、经正记三家，且仿当时流行的西班牙本洋，铸造银币，俗称上海银饼，币面标着发行商家及年分和监造人的姓名。币重分一两及五钱两种，可见沙船商富裕的一斑。其中专走山东各埠的名"卫船"。专走福建的叫"南船"，又名"硬档船"。走宁波的有"宁船"，驶长江的有"鸭尾船"。其他如走无锡的"无锡快"，走江北的"江北快"。又有船头较阔大的名"蒲鞋头船"，客船停泊揽载人和货物的称"南湾子"，分大中小三号。往来定期的有"航船"。没有帆的小船为"舢舨船"和"脚划船"，有本帮淮扬帮两种。又如"滩船""提船""帐船""驳船""码头船""摆渡船"等。据市政厅征收船只税章

程，各种船只分二十一类，可见名式是很多的。总之，停泊南市的，须到工程局领照，停泊北市的，须到工部局领照。

招商局轮船和外商轮船的竞争

轮船之出现于上海，以一八三五年(清道光十五年)的"嘉定号"为最早。过了七年，鸦片战争起，英国军舰"纳密雪斯号"悄悄地停泊吴淞炮台附近的海面上，船上装有两尊可以发射三十二磅重炮弹的大炮，那司令官孟得高默理上校下令开炮，清兵抵抗不住，纷纷逃跑，炮台便被英军占领。司令官带了一千名士兵，沿着黄浦江，由陆路向上海进发。"纳密雪斯号"却在黄浦江中向上行驶。那一千名士兵一直向上海县城前进，沿途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到了老北门口，城门已经关闭，上校便命兵士两名，由城墙爬上城头，到里边去把城门打开。上校率兵进城，真是耀武扬威，并来一套安民告示，禁止抢劫，但他却向城中绅民勒索了赔款十四万五千金镑，然后离开了上海城向南京而去。这样一来，上海的门户从此便大开了。到一八四三年，英国所派第一任驻上海的领事官乔治·拜尔福上尉乘了"密求沙号"轮船来到上海，船上满装着家具、行李箱笼，以及洋酒、罐头等食物，甚至连甲板上都堆满了这位领事和他手下许多办事人员的东西。船到了岸，因一时没有住宿之处，所以当晚仍在船上过夜。那晚这班人在舱中一盏火油灯下面进餐，大家举杯，预祝上海的未来繁盛。这无非为将来更大规模地经济侵略

作好准备。一八五〇年，大英轮船公司开始上海香港间的航行。一八五三年，美国罗塞尔公司的轮船来沪营业，他们知道华人是崇拜孔夫子的，便把船名叫做"孔夫子号"。过了三年，比赖斯氏雇工用中国木材造成十二匹马力的四十吨小轮船一艘，取名"开路先锋号"，这是外人在上海建造轮船的开始。当时南北及长江流域的洋货输入，大都用民船装运，原来外人尚没有获得内河航行权。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订立，结果天津、汉口、九江各埠同时开放。一八六一年，长江及各支流的航路都随之开放，允许各国商船自由行驶。次年，美国罗塞尔公司于上海设立旗昌洋行，从事长江及北洋的航业。这时有一种"木轮船"，行驶苏杭等地，机器形如水车，全用人力，足踏机轮，轮动船行，可是费力多而行驶缓慢，不久就废止了。

我国自办的合资轮船公司，当推招商局规模最大。同治十一年(1872 年)，总办浙江海运的浙江候补知府朱其昂和其弟总董江苏海运的朱其诏，兄弟二人同在天津，看到江海航利都给洋商夺占，因以挽回权利之说，进呈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奏设轮船招商局，委朱其昂为总办，朱其诏为副总办，议招"商股"一千股，每股先收银五百两。可是风气未开，认股者寥寥。朱其昂没有办法，只能把自己的家产一齐拿出来，更借了许多债，但力仍不足，于是请李鸿章奏借官款，才得成功。洋商"怡和""太古""旗昌""禅臣"等行，故意把自己轮船的运费压低，使招商局亏折，无法维持。招商局当然受到影响，朱其昂又请李鸿章加委盛宣怀、唐廷枢、徐润为总办，联络商号，发展事业。"太古""怡和"等知道招

商局基础已稳固，便变其破坏之谋，而为联络之计，公议运货搭客，“招商”“怡和”“太古”三公司价目划一，彼此不得低落，违者罚款，行径手段，是很卑鄙的。招商局最主要的目的，便是承运漕米，并试行汕头、宁波、香港等地。经积极进行，订购轮只，航线北达天津塘沽，南抵广州、香港，东到长崎、神户，而以上海为中心。后来美国旗昌洋行把在上海及各埠的房地产和轮船等，作价售与招商局，从此该局声势更盛。一八七五年秋间，该局货轮曾驶往檀香山，隔年又开往旧金山，我国商船航行国外，这是值得纪念的。到一九〇〇年，该局除在全国通航各地购置大量房地产并修建仓库码头外，且拥有船舶二十多艘。更把所得利润开发唐山等四处煤矿，又大量投资创立中国通商银行。一九三三年五月，复利用中英庚款三十六万金镑，定造海轮四艘、江轮三艘。抗战军兴，该局轮船四十余艘担任军事运输，结果沉掉十五艘，被敌机炸毁也有十多艘，仅存“江顺”“江安”“江新”“江华”“江建”“江汉”六轮，损失惨重，元气大伤。此外有三北轮埠公司，航线如重庆、海州、福州、宁波，有时兼行上海至海参崴，上海至仰光、南洋群岛，上海至日本。又南通张謇在上海设立大达轮船公司，陆伯鸿建立大通航业公司。两公司后来实行联运，各地都建有趸船及仓库。

摇舢舨发迹的叶澄衷

浦江两岸，人口稠密，往来摆渡，大都仗着舢舨。这种小船，尾艄翘起，在浪潮中出没着，看去似乎有翻覆的可能，实则摇舢舨的，具有熟练技巧，决不致出乱子，此中还出了个有名人物，那就是叶澄衷。他是浙江镇海人，出身农家，自幼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后由同乡带他到上海来学习木器业，很是勤勉。可是那主人性情暴悍，动辄骂人，他不堪其虐，便忿然离去，学习摇船。后来租了舢舨一艘，往来浦东浦西，且贩了些果品食物，兜售乘客，博些利润。有一天，浦江中停一外国兵舰，忽一军官自岸上来，呼他渡到兵舰。军官登舰后，舰就启程出口，他检点舢舨舱中，发现一个皮囊，知是军官的东西，就好好地藏起来。过了相当时期，兵舰又来，他便把原物送还军官。军官大加赞扬，给他报酬，他又不受。军官因此对他说："兵舰重地，不许小贩驻足，你很诚实，独许你登舰做生意。"并给他出了一个证明书，从此他得以自由往来，即其他外国船只，也不禁止他，生意很好。其时恰巧有个西商运五金杂件来上海，设立一商铺，没有经理，叶澄衷和西人相处日子多了，能说普通英语，这西商见他诚实可靠，颇有能耐，便请他担任经理。数年之后，营业大大发展，不独五金事业在他掌握中，即其他土货洋货也由

他销行内外各埠。他积了很多资财，便沽名钓誉，在虹口购地创办澄衷学堂，和杨斯盛所设的浦东中学，最初都不收学费，名义上是照顾贫寒子弟的。

那舢板船在抗战胜利后，却有一种特殊的用途，说来是很滑稽的。原来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的接收大员到了上海，搜刮了大量的黄金，但又想掩饰其贪婪面目，便给市民一些小恩小惠，就是市民凭居住证可以出较低的代价，换取黄金一两，由外滩中国银行兑发。这么一来，银行门前挤得水泄不通，大家拚着命地挤，甚至挤死了很多老弱妇女。那时晚上是戒严的，天不亮不得开放，在戒严时间，马路上不许人逗留。那么兑黄金既不能太早，又不能过迟，且兑换是有限制的，迟了排在后面就挨不到。却有人异想天开，隔夜预雇了停在江边的舢板船，人即踡宿在船上，一到天亮，戒严令解除，开放行人，他就捷足先登，获得兑取黄金的优先权。可是这小小的秘密，不久便给人家知道了，纷纷地效法，为了争雇舢板，闹成斗殴。结果由军警把所有的舢板完全驱逐掉，不许靠江停泊。

具有神力的万篙头

和轮船取得连络，装运货物的，便是"驳船"。上海最有名的大流氓范高头，就是撑驳船的。他其实并不姓范，名字也不叫高头。他的真姓名是赵阿宝，原在浦江一带撑驳船为生。他两臂的力气很大，为他人所不及。当时外国商轮早在我国沿海沿江随意驶行，有一天，一洋商的船行驶过速，撞翻了一艘装满货物的驳船，那商轮的驾驶者仗着洋商的势力，当做不看见。许多船夫一同前来拦住那商轮，但哪里拦得住，赵阿宝在旁边瞧见这些船夫没有办法，就自告奋勇地一篙搭去，那商轮便停顿下来。于是许多船夫移船紧靠，一跃而登商轮，和商轮负责人员办交涉，终于由商轮赔偿损失了事。这么一来，人人都称赞赵阿宝的神力，说他的一篙胜过万篙齐发，因此江湖上替他起一诨号万篙头。后来以讹传讹，变成了音同字不同的范高头。赵阿宝不加纠正，也以范高头自居。地方上的恶棍土匪，大家拜他为师，凡船业中人差不多都是他的徒弟，声势非常浩大，他就无法无天，犯了许多案子，罪恶难以计数。据见过他的人说，那范高头方面大耳，气概不凡，生平不穿长衫，就是外出应酬，也是短衫一袭。那短衫用了很阔的滚条，纽扣特别多，外加一件披风，头戴大红结的瓜皮帽，脚穿双梁快靴。这种神

气，一望而知是个白相人。他鸦片烟瘾头很大，一副烟具，考究非凡，烟签、烟匣、烟灯，都是黄金所制，是一位有钱的徒弟特地打成了孝敬他的。他党羽很多，官府没有办法捉他到案。不知哪一位献计，利诱了他的同党林得胜，把范高头骗去就擒。当时上海投机的戏院子把他的事情编成戏剧，连卖满座数十天，大大地赚了一笔钱。小说家毕几庵编辑《上海画报》，觅得他临刑前的照片，铸了铜版，登在画报上，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他在苏州王废基的演武厅前伏法。苏州父老们直到现在，还有人能讲他伏法时的状况呢。

一件撞船惨案

洋商船只横冲直撞，翻了我们的驳船，这还是一件小事。更属肆无忌惮的，是一八七五年四月四日，英国轮船"海洋号"撞沉我国轮船"福新号"，死伤了很多人，今天想起，尚觉惨不忍言。原来"福新号"是我国招商局轮船之一，是由上海开往天津的。这天天气晴朗，海面上并无风浪，"海洋号"错行了航线，在黄海中把"福新号"轮船的右舷撞成一个大洞，全船在数分钟内即告沉没。当时"福新号"船上顿成混乱状态，水手和乘客都争着跳进救生艇逃命。因水手等张惶失措，以致救生艇只有一艘平安抵岸，其余全告沉没，丧失了很多人的生命。死者的家属齐向招商局吵闹交涉，招商局唐总办即写了一封公函给"海洋号"的船主博朗，问他对于此案拟如何解决。但所得的回音只是在回簿上用铅笔注上两个英文字 W.B.（即 William Brown 的缩写），表明这封公函已经收到，此外并无只字答复。招商局不得已，向英国领事馆起诉，这案子便在同年六月十一日由英领事麦特赫斯德开庭审理，上海道台沈秉成也到场观审。被告人博朗请威恩拉德和翰伦两人做辩护律师。这天，法庭上挤满了死难者的家属，大家忧容满面。原告要求每名死难者抚恤一千两银，赔偿总数为六万三千两银，法官把

案中的证据看了一会，即宣告展期。第二次审期定在一个月后，但临审之前，却允准"海洋号"轮船开驶他处。招商局得讯后，立刻又写一封公函给英国领事，力请下令禁阻该船离埠。其中有一段说："我们得知这轮船已由海关准其他驶，但这船决不能让它离开上海，一旦离埠，那么将来法庭即使判决了抚恤，叫我们又从何处去取偿呢？"信末还特别加上一句："务请注意这件案子于中外关系上是有很重大的影响的。"第二次开审，英领事却称这次诉讼中的被告人是"海洋号"的船主，而并不包括轮船本身，所以他无能为力，不能禁阻它出口。至于这只轮船，却于上一天开走了。原告律师觉得英领事的话太不合理，心里很不以为然，提出辩论。但法庭却宣告午餐时间已到，就此退庭。下午继续开审，英领事便宣读他的判决辞："我们对于这件案子，很觉难于下判，现经仔细考察，此次生命的丧失，是由于'海洋号'船主的过失所致，所以我们的判决是'海洋号'船主应赔偿原告所受的损失，死难旅客每名三百两银，仆役和水手每名一百两银，共应赔偿一万一千两银子。"死难者的家属没有办法，只能同意这判决。领取赔款时，英领事却又说，他并没有执行的权力，所以无从强制执行这一项判决。此外他也没有别的法子可以补救。这案也就不了了之，那是多么使人气愤的事！

淞沪铁路拆而又建

淞沪铁路，起初是由英商怡和洋行玛礼逊创筑的。那时仅从上海老靶子路通到江湾，引起了地方官民的反对，认为这种"铁马"，足以亡国灭种。恰巧有一农民给火车辗毙，于是乡民集合成群，势将毁路。幸两江总督沈葆桢出面调停，才保无事，但空气仍很紧张。英公使威德氏看到情况不佳，便和清廷洽商，由政府出资把铁路购去，以免召祸。结果偿英商银二十八万五千两，把该路购回拆毁，所有车轨等件移至别处。在这二十年间，南方没有人敢议及铁路事业。直到一八九六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张之洞，援北洋修筑军用铁路之例，奏请复筑淞沪铁路，获得清政府允准，一八九七年开工，次年七月竣工。路线由靶子场起，经张华浜至吴淞炮台湾。不招商股，不用外债，完全是我国自力修筑的铁路。一九〇四年归并于沪宁铁路，可是沪宁铁路早由督办盛宣怀向英商银公司订借了二百二十五万英镑，作为修建费，主权便落入外人之手。且设总管理处，洋员占着多数，会议取决，都由洋员掌握。一九〇九年，更订办事章程，撤废总管理处，以华人为总办，兼议员领袖，主权始渐收回。

上海的铁路，除沪宁线外，尚有一干路，即沪杭甬铁路。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沪杭甬铁路和沪宁铁路接轨，由新龙华站北经徐家汇、梵皇渡，沿吴淞江东折，至潭子湾与沪宁路衔接，两路直接通车。

记得在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不顾民意，发动内战，加紧征粮，以应军需，结果引起物价飞涨、人民缺粮的现象。上海学生举行反饥饿争取全面公费的游行示威运动，且向南京教育部请愿，各大学生群集北火车站。这时伪上海市长吴国桢，立命铁路当局停止行驶。交通大学土木系的学生自行开车，直达目的地，使这个运动继续发展下去，这在学生运动及交通史上占着重要的一页。

五卅事件发生在大马路上

上海最主要的一条马路是南京路，它本名花园弄，俗称大马路。从最早的照片看来，市面是冷清清的，两旁是简陋的二层楼房。朝南有一屋，门前有栅栏，檐角突出的，便是保安司徒庙（俗称虹庙）。又有一张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照片，两旁商铺较为繁荣，有石库门的，有阳台上悬着小招牌的。路上行人都拖着豚尾式的发辫，车辆只有人力车，马车也很少见到。那时的南京路东至外滩，尽头处矗立着一座铜像，所以那儿叫做铜人码头。这铜像是英人巴夏礼。像基的铜碑上镌着中西文，是一八九〇年四月八日建立的。巴夏礼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最初在北京英国公使馆做参赞，一八六二年来到上海。那年正是太平军进攻上海，江苏巡抚薛焕引狼入室，商借英法两国军队，就是由巴夏礼为代表向英国接洽的。一八六四年，他做上海领事，开始实行租界会审制，由此侵犯了我国的法权。一八六五年，他调往日本任公使，共十八年。一八八三年，又调到我国来做公使，但仅做两年，就死在北京，终年五十七岁。外国寓华官商为了纪念他那侵华政策的"业绩"，便在南京路尽头立了这座铜像。

南京路河南路口，俗称抛球场。现在看起来，是有名无

实的。实则最初那儿确有个球场，西人在此运动，锻炼身体。后来地价狂涨，西人便把这球场高价卖掉，改造市房。虽然旧时的遗址已一些也不存在，但人家叫惯了，仍旧称它抛球场。这和同在南京路上(浙江路口)的五云日昇楼一样，在从前也确有一家茶馆名叫五云日昇楼的开设在那儿。这日昇楼和一洞天都是南京路上最老最著名的茶馆。相传名震大江南北的大力士马永贞，即在该楼被仇人害死。原来马永贞时常到日昇楼来品茗，仇人伺候在楼梯口，等他上楼，便把手中石灰包抛掷过去，先迷了他的双目，然后把他殴死。

南京路靠近外滩有家戏园，叫谋得利小剧场，为我国话剧的发祥地。从一九一〇年起，正是话剧萌芽时期，常有爱好话剧者，租借该处演出。最先为社会教育园，其次为新民社，最后为新剧同志会，称春柳剧场。该组织之中坚分子有主编《辞源》的陆尔奎的儿子陆镜若和吴我尊、马绛士、欧阳予倩等。起初在日本东京上演，宣统末年，各社友相率归国，在上海提倡新剧，经这一提倡，继起的有民兴、民鸣、春阳、药风等新剧组织，几如雨后春笋。据说民初宋教仁曾假座这戏院开了一次演讲会，反对袁世凯称帝，袁世凯的鹰犬应夔丞暗招亡命之徒，预备刺死宋教仁，结果物色到了武士英，因为武士英在谋得利听过宋教仁的演讲，宋教仁的面目尚在他的记忆中，不致误杀他人。

新会梁任公曾在南京路抛球场口开设大同译书局，清廷一度派人往书局捕他，他不在，捕去他的包车夫和仆人胡某，送书人唐某也被逮。

富商杨子京，大家都叫他杨宝宝，在六七十年前，老上海都知道他。他看到菜贩做小生意，动辄被巡捕抓去，无处可以驻足。乃发恻隐之心，出资在南京路五福弄口建一小菜场，虽竹架芦棚，非常简陋，但却是上海最早的一处小菜场，俗称东荒场菜场。

辛亥革命后，清帝溥仪让位，当时派唐少川为代表，和民国代表伍廷芳议和于上海市政厅。市政厅为西人议市政的会址，四周用红砖筑墙，在当时是很新颖的。地点在南京路云南路口。

凡黄浦滩沿岸及南京路一带，按西人工部局章程，不准华人婚丧仪仗通过。时前清户部侍郎曾纪泽的妻子在沪病殁，和租界当局相商，由工部局特送照会，得在南京路通过殡车。后来李鸿章逝世，丧柩过沪，拟援曾例举行。不料工部局认为可一不可再，竟加拒绝。

五卅惨案，便是发生在南京路上的。那地点在今六合路东，从前老闸巡捕房的后门口（今大光明钟表商店）。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的工人学生等为抗议日本纱厂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在公共租界各繁盛马路举行演讲宣传。南京路上学生和群众，愈聚愈多，巡捕到处抓人，引起听讲群众的愤怒，一时聚集在老闸捕房门前的约有数千人。印捕在英捕头爱活生指挥下，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死九人，重伤十五人。因此南京路一带商店首先罢市，其他各处也纷纷响应。十万余工人，一起罢工，表示反抗。当时友联影片公司曾拍摄五卅惨案新闻片，把南京路流血地点，摄得尤为突出。后来该公司主持人陈铿然把这部片子赠给工商

学联，作为纪念。

由创造新型画的吴友如担任绘画主干的点石斋画报馆，据姚公鹤的《上海闲话》所载，即在南京路泥城桥堍，且设有点石斋石印局，为石印书籍的开始。石印的《康熙字典》，第一批印四万部，不久即完全销去，获利很多。那画报以新事物为题材，同时周慕桥、何元俊、田子琳等，纷纷仿效，也在画报上担任作画。但那画报馆是西人美查创设的，吴友如颇感束缚，不久他就自己办《飞影阁画报》，成为《点石斋画报》的劲敌。

上海的热闹中心便是南京路。南京路的中心，要算浙江路口日昇楼一带。不料在抗战初期，日本飞机在这最热闹的地点上，掷了一枚重磅炸弹，首当其冲的是先施公司，铺面都给炸毁了。永安公司门前炸成了一个大洞，一哩以内的玻璃窗都被震碎。地上都是死伤的人，真所谓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共死二百五十人，受伤的五百五十八人。正在行驶的汽车也被炸坏，其中并有一辆旅行团的游览车。

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在同治十三年夏所发起的《汇报》，报馆设在南京路，集股两万，投资多为粤人，招商局总办唐景星出力更多。曾请黄子韩、贾季良为编辑，后来因新闻中涉及官事，股东不以为然，便顶给人家，改名《彙报》，最后又改名《益报》。

赫赫有名的犹太富商哈同，他有了钱，进一步就需要势，于是竭力钻营，在工部局占有董事的一席。可是英人故意留难他，要他做一件对公众有益的事，作为进身之阶。哈同便发愿出资铺南京路，从泥城桥起到外滩止，完全用铁藝

木铺成。这些铁梨木都是削得方方正正的，据老上海谈，当时每块铁梨木的代价是一角半，共用去四百万块；雇一百二十个砌街匠，每工一角二分，凡两个半月才全部竣工。

电影院没有建立之前，南京路泥城桥堍的隙地上，就有人搭着篷帐，放映具有笑料性的短片。泥地上排着长凳，每人纳费三十文，居然天天满座，大发其财。

西藏路泥城桥，是南京路的西尽头，西藏路本是一条河，泥城桥是架在河上的。过了泥城桥便是静安寺路。静安寺路现在和南京路归并在一起，称为南京西路了。

静安寺路的静安古刹

过去把今南京西路称为静安寺路，这是因静安寺在这条路的西首而取名的。静安寺相传建于三国吴大帝赤乌年，为几千年前的古刹。每逢阴历四月初八浴佛节，庙会很盛，沿街所设摊头，自泥城桥直达寺前。寺的前后一带，昔称阮村，有所谓"阮村八景"，如"古寺钟声""古井观虾"，都是属于静安寺的名胜。寺前有应天泉，品为天下第六泉。泉中有虾，无须无芒，相传梁时一个和尚念了咒语，虾化龙飞去，这当然是不足凭信的。据说从前寺旁尚有陈朝桧、赤乌碑、绿云洞、讲经台、沪渎垒、芦子渡等，古迹是很多的。

现在的人民公园，便是从前的跑马厅。跑马厅的历史相当悠久，且很复杂。以前有过《上海跑马厅史料》一书，从一八五〇年起，直到一九三〇年止，都有详细的记录，有图有文，可惜这本书绝版已久，不易看到了。据《上海研究资料》所载："跑马厅，西侨所组织，成立于一八五〇年。第一次场地在花园弄（今南京路）界路（今河南路）转角处，占地八十亩，作为赛马及别种运动之用，人称之为老公园。上海第一次赛马即在其中举行。一八五四年，因地价高涨，第一场地即出售，另在浙江路与护界河（今西藏路）之间购地，辟上海骑马场，作为骑马与赛马之用，人称为新公园。接着因

东段地价日增，又嫌第二场地作为运动场之用，过于浪费，于是在一八六二年，由二十四位股东购置静安寺路以东、西藏路以西的广大地亩，布置今日的跑马场，其名为新赛马场。我国人一向称它为跑马厅。跑马厅内共有两个跑圈，外圈的一个草地是属于新赛马场股东的，里圈则属于上海运动事业基金董事会。每年于五月及十一月各举行赛马一次。我国人早已有参加该场博注的。”当初开辟跑马厅，是有过一段血泪史的。如《李氏家乘》所载：“西人在沪北泥城桥外圈地作跑马厅，我家田被圈者四十余亩，以每亩银二十五两作价。”如果倔强不肯出让，或祖宗坟墓所在，不愿脱售，该公司便就各户不肯出卖之地，四面包围，使该地没有进出的路，手段是很卑劣的。那时赛马的终点有一石牌坊，那便是人家的坟墓，被西人硬圈进去的。敌伪时期，把跑马厅西面的崇楼作为米粮统制会，致一般公务员陷入枵腹从公的生活。

跑马厅的对面有两尊巨大的翁仲石像，袍笏衣冠，很是庄严。据老上海谈，这石像原为离沪十余里某姓坟上的东西，由某西人出四十二圆代价，搬来作为装饰品的。岂料一班愚夫愚妇，误认为菩萨，前来烧香膜拜。后来更有那些打花会的赌徒，半夜三更前来点烛焚香，虔诚默祝，希望他的赌运亨通。由于历来香烟熏灼，把石像的下半截都熏黑了。当局贴了布告，再三劝诫，可是烧香的反而越来越多。后来没有办法，便决定把石像移到闸北。但挖掘不慎，石像折成两段，后来也就不知去向了。

在石翁仲的西邻，开设了一家大观园菜馆，虽地面不

大，却把它辟分为怡红院 潇湘馆、蘅芜院等。那些女招待，在怡红院的，便在胸前标着袭人、晴雯等名，在潇湘馆的，便称为紫鹃、雪雁，蘅芜院的有莺儿、文杏。居然红楼中人，一一涌现在人们眼前，可谓异想天开，但是地方局促，不能发展，不久也就停业了。

静安寺路畔有两处园林，一处是味莼园，一处是爱俪园。现在先谈味莼园。该园本为西人格农所筑，占地仅二十余亩。光绪十年，被无锡张叔和购得，由此大家都叫它张园。园外柴扉题着"烟波小筑"，门外古树上榜着"味莼园"三字，是仓山旧主所写。后来，园地由二十余亩展拓为七十余亩。有广厦可容千人，名叫"安凯第"，游客可在这儿喝茶进餐。因为"安凯第"是西式布置，很受人欢迎，凡各种议事、演说、跳舞、宴乐，都假此举行。清末，寓沪革命党人也多在此聚集，公开宣传民族革命，曾被清廷指名捉拿。辛亥革命既成，孙中山即出席演说，过了一天，就往南京任临时大总统。园西南角有楼名"海天胜处"，设有髦儿戏班。有时演唱昆剧或滩簧，滩簧名家林步青常在这儿现身说法，尤为滑稽可喜。园中百戏杂陈，有所谓"飞龙岛"，供客乘坐，仿佛凭虚御风，飘飘欲仙。有硖石灯彩，细致玲珑。某年江淮年荒，力谋赈济，乃举行赛珍会，大家闺秀和女学生，便在会上出卖绣帕、香囊、纽扣、鲜花，作赈灾之用。会场中布置诸葛武侯八阵图，走了进去，往往迷住不得出。又水中置银元和金币，可任人拾取，然水通电流，入水手感麻木，只得敛缩，有可望而不可即之概。又时常在那儿放大汽球，平时入园不售门票，放汽球时，门票每位一元。球下有一络，一西

人坐于络中，随球上升。升到最高处，观众都仰首上望，拍手欢呼，约半小时许，球和络脱离，西人张降落伞飘荡而下，因风的大小，降落地方不固定，所以备着救命圈，虽坠入黄浦江中也不妨事。这种西人是雇佣的，每次得酬四元。有时为查禁鸦片，搜得的烟土，往往在园中当众焚毁。有时更在园中放焰火，所以当时说到张园，几乎是妇孺皆知的。还有一个便是爱俪园，因为是哈同私人的，故又叫哈同花园。解放后在这旧址上建筑了中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馆）。这园的建筑，带着庙宇色彩，原来是由一个和尚乌目山僧布置设计的。有什么"海棠艇""接叶亭""蓬兰室""絮舞桥""昆仑源""冬桂轩""水芝洞""小瀛洲""北洞天""饮蕙崖""铃语阁""涵虚楼""九思庾""逃秦处""山外山""万生圃""笋蕨乡""燕誉堂""廛谈室""万花坞""西爽斋""养生池""涌泉小筑""延秋小榭""黄蘗山房""阿耨北舍"等，大都是取江浙各名园的胜迹仿造的。园中常有一班遗老的足迹，如沈寐叟、朱古微、岑西林、王静安，不下数十人。这许多很雅致的名称，十九是这班人代题的。里面还办了一所仓圣明智大学，礼堂中祀着仓颉、史籀、程邈、史游、许慎、蔡邕、钟繇、李阳冰等先贤像。学生学习古礼，什么乡射、投壶、冠昏，这些都是遗老搞出来的玩意儿，简直大开其倒车，完全与时代脱节。更有一事是极矛盾的，园中既容纳一班遗老，却又接待一些革命党人，如孙中山、章太炎、蔡元培等，都一度下榻园中。因为山僧也具有革命思想，所以和党人有相当的联系。据说章太炎和汤国梨女士的婚礼，便是借园中"天演界"举行的。"天演界"是演剧的剧场，容座千人，地方

是很宽敞的。

爱俪园东边有家雪园菜馆，现已停歇。那雪园有几样名菜，所以营业很不差。清晨利用空座卖茶。当时尚在抗战时期，吴中人士流寓上海的很多，每星期日上午，大都到这儿来品茗清谈，如包天笑、屈弹山、王佩诤、王欣夫、范君博、范烟桥、赵眠云、张云抟等，都是这里的座上客。君博善做诗，他目睹日寇的凶暴，汉奸的献媚，非常愤慨，便借诗发泄；其他几位能做诗的，唱和起来，结为"霜社"，取与雪园的招牌作一对偶，并取霜和孀声音相同，认为入社好比孀妇守节一般，决不动摇。从此每月集会四次，诗稿积得很多，名《霜社集》。不料后来张云抟受伪组织的利诱，登上傀儡舞台，大家都认为是霜社的绝大耻辱。

第一次出现在上海的有声影片，是百代福托风，片名《飞行将军》。即在静安寺路夏令配克电影院上映，在报上登着极大的广告，轰动一时。那夏令配克后来改建为大华大戏院，便是现在的新华电影院。

现在的大光明电影院和以往的大光明电影院绝不相干。以往的大光明在静安寺路派克路转角，和卡尔登戏院（今长江剧场）为贴邻。由姓勇的主持。一次放映罗克主演的美国影片《不怕死》，洪深前往观看。岂知不看犹可，看了使他怒发冲冠，不可遏止。原来该片是演唐人街的华侨生活，影片中的华侨做的全是无耻卑劣的勾当，不是吸鸦片烟，就是贩卖人口、做盗贼。洪深是早期的留美学生，对于唐人街一带的情况是很熟悉的，事实上决没有影片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这显见是故意污辱我们。充满正义感和爱国思想

的洪深，怎能容忍得住。电影放映到一半，照例休息十分钟。洪深乘此休息时间，三脚两步跨上台去，向观众演说，痛斥该片的荒谬，认为辱及我国的华侨，也就是藐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洪深没有说完，观众都满腔义愤，不约而同地嚷着退票，一时秩序大乱。大光明电影院的老板把洪深看做捣蛋鬼，指使人抢上去一把揪住，任意殴打，把洪深的眼镜打掉，衣服也扯破。观众更为不平，到外面去叫了警察来，一同到警察局，先存了案，然后向法院起诉。大光明老板虽有的是钱，贿赂法官袒护他，可是洪深一起诉，上海的名律师自告奋勇，为他义务辩护的竟有十位之多。开庭的那天，旁听席挤得水泄不通，各报都以绝大篇幅来报道此事。法官看到舆论如此，不敢偏袒，洪深终于获得了胜利，一切损失由大光明赔偿，并向洪深道歉。《不怕死》影片也停止放映，并打电报给罗克提出责问。罗克知道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只得表示歉意。申明以后有机会一定来中国游历，了解实际情况，再拍一部介绍中国的影片，纠正以前的错误。实际上，这无非是敷衍之辞，罗克始终没有到中国来，也没有演过介绍中国的影片。

现在的仝羽春茶馆，据说那招牌还是吴趼人代取的。茶馆之前，为一戏院，昆、徽、京各戏，无所不演，甚至通宵达旦地演着，这一点是很特别的。

新世界游艺场，规模很大，在南京路西藏路口。可从南京路南口进门，从南京路北口出来，望衡对宇，成为一家，下面有地道可通，这是仿苏州火车站的地道建造的。据说当时开这地道，煞费周章，租界当局认为南京路是唯一交通要

道，车辆往来，不可胜计，且有电车行驶，万一地道载不起重量，下坠伤人，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不能批准。后经新世界主持者花了一笔巨款，才得打出照会。开幕之初，把这地道大大宣传一番，于是轰动一时，大有万人空巷之概。此后且开花榜，选举花国大总统，更办《新世界报》，处处和大世界争奇斗胜。不料"一二八"之役，租界当局以保卫西侨为名，开来了许多外国兵，占据了新世界作为营房，游艺只得停业。年余后外国兵才退出，然内部已被破损，不能复兴，地道也就填塞了。

静安寺的对门有万国公墓，为诗人吴北山埋骨之地，吴北山是庐江人，和潮阳丁叔雅，都以文学才艺有名于时。戊戌六君子被难，他流涕赋诗，曾发愤上疏，为死难者诉冤。辛丑和议，他又请变法归政，亢直异常，朋好替他担忧，他却毫不在意。又忠州李芋仙的墓，也在静安寺侧。李原名士棻，著有《天瘦阁诗集》。据说当时朝鲜人很慕他的大名，每贡使到我国来，必到他家处问好，赠送他许多礼品，求得他的诗文带回去。

王韬也在上海居住过一个时期，所谓"蘅华馆"，即在南京路马霍路口，蒋敦复、郭友松一辈名士，常到他那儿谈天说地。后来西人艾富尔曾借"蘅华馆"开一油画展览会，为上海举行画展的嚆矢。

中国的华尔街——二马路

上海租界的外国银行，在同治四年，共有十家之多，大都集中于市中心区。当时在九江路（俗称二马路）的便有两家：一家是阿加剌银行，在九江路一号；一家是有利银行，和阿加剌贴邻。较后开设在九江路的有美国的花旗、大通、运通，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朝鲜，荷兰的安达，德国的德华等九家，我国的有华侨和聚兴诚两家。银号有中源、仁德、顺兴、双盛四家，这儿简直成了中国的华尔街。

赫赫有名的赛金花曾在九江路的彦丰里住过。她领了两个妓女，一个叫月娟，一个叫素娟，由她们出面挂牌。自己化名曹梦兰，亦干着卖笑生涯。大家知道曹梦兰是状元夫人，都想一瞻丰采，所以门前车水马龙，很是热闹。当时她和老伶工孙菊仙的族侄孙少棠同居，孙少棠靠了她滥吃乱用，把钱完全花去。这样经过五年，一般客人对她有些厌倦，她便迁往了天津。

从前演戏，没有男女合班，男女合演被认为有碍风化。女子演出的称髦儿戏，生旦净丑都由女子扮饰。最早的髦儿班戏院，是二马路石路口的美仙。其中的角儿，花旦如林凤仙，须生如吴新宝，青衣如王桂芬，都足与须眉竞胜。但武戏却自胡家宅群仙开场。

鉴墨斋装裱店在九江路，楼有余屋，招人租赁。全屋租金八元，余屋只收三元。这时上海刚光复，一切没有秩序。都督府在华界，租界和华界交界处晚上戒严封锁，进出很不方便。在都督府任职的黄岳渊，偶过九江路，瞧见招贴，便租赁下来，略置桌椅，并备榻位，晚间不及返都督府的，得借宿其间，把它权充公寓。书家邓散木的父亲，也参加这个组织。但这种组织没有名目，请邓老先生取名。邓老先生说："我们穷无所归的，现在有了归宿了，不如径称之为穷人会。况且穷而后工，穷且益坚，都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那么何必讳穷呢！"大家都赞成，即以"穷人会"命名。黄岳渊后来专事园艺，为海上栽菊名手。

九江路口的红礼拜堂为上海具有悠久历史的教堂，本名圣三一座堂。那时筑屋都用青砖，这里却用红砖，因有此名。里面的花窗，每一扇都缀着有功于教会的名人像，无非借此以留纪念。堂上有塔型的东西，高耸云霄，很远即能望见。据说从前堂前尚有半圆形大池塘，里面蓄着数百尾金鱼，碧藻红鳞，很是动人，现在这池塘已填没了。西人结婚大都在这儿举行仪式。

山阴画家俞达夫在九江路开设一茶馆，名文明雅集，布置雅致，和其他茶馆不同。俞是任伯年的高足，所以同道画家都到这儿来喝茶清谈，品评艺事。又有一班喜弄丝竹的，张灯射虎的，谈艺着棋的，纷纷集合其间，差不多把它作为俱乐部，日本伊藤博文被刺受伤，文明雅集举行了一次蜡人展览会，蜡制的伊藤陲在玻璃盒子里。这时上海人士尚未见过蜡人，看到了逼真的人像，没有一个不诧为奇观的。

三马路的新闻报馆

汉口路俗称三马路，那儿有两家很老的书店，一家是千顷堂，专售木版和石印的书籍，印有千顷堂书目一厚册，嘉惠士林，确有相当贡献。另一家是蟫隐庐，为甲骨文专家上虞罗振玉的弟弟振常所开设。他精于版本学，影印了许多宋刊孤本，如世彩堂本《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等，当影照时，他亲赴津门，察看版刻纸墨，非常郑重。后来振常倦于业务，把铺面让给人家，所有剩书，完全搬到他安远路金城里家中。不久，他就病死了。至于艺苑珍赏社，系无锡秦氏所办，影印碑帖画册，开办年份较迟于以上两家。

新闻报创始于一八九三年二月十七日（清光绪十九年元旦），是由中外商人合办的。该报一度为美国人福开森所购得，聘汪汉溪为总经理，汪为报界四巨头之一。最初的馆址在望平街南首，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才在汉口路建造新屋。次年福开森让出股权，该报才完全入于华人之手。该报开创时，正主笔是别号缕馨仙史的蔡尔康，继之者为撰《海上繁华梦》的孙玉声。严独鹤主持附刊"快活林"和"新园林"，庄谐并录，精神一贯，使该报销数日益增加。后来又发行《新闻夜报》，那就由严独鹤全力主持了。

比《新闻报》资格更老的，就要推《申报》了。该报创刊于

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最初由一中国通的英人美查所主办，后来转了几个手，由席裕福出七万五千元代价购得，主权才归华人。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史量才又以十二万元代价向席氏收购。史量才请陈景韩(即冷血)为主笔，锐意经营，直至蒋政权时代，以言论锋利，触犯了蒋介石，结果史量才给人狙击致死。该报不但具有历史性，且人才之盛，也在当时各报之上。先后在该报供职的，有王韬、钱昕伯、何桂笙、高太痴、周品珊、黄式权、蔡尔康、袁翔甫、朱子美、刘申叔、金剑花、孙东吴，以及著《海上花列传》的韩子云，都是知名之士。主编过副刊的，有王钝根、吴觉迷、姚鹓雏、陈蝶仙、周瘦鹃。周瘦鹃任职最久。开创新姿态的自由谈附刊的是黎烈文，那时鲁迅的文章发表得很多，奈在白色恐怖下，只得经常化名。抗战时，该报曾停刊过。申报馆本在红礼拜堂对门，以后在汉口路望平街口的巨厦，建于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

《苏报》一案，轰动了当时社会。苏报馆主持者为陈范。案发，清吏会同租界巡捕房往捕，恰巧陈范到日本去了，没有被逮，捕去章太炎、邹容等人入狱。清廷组织额外公堂，延律师声述案由，有云："陈范住三马路二十号门牌。登报大逆不道，污蔑今上。"那所谓三马路二十号，因房屋一再翻造，已找不到当时的原址了。至于苏报馆，那时是设在四马路的。

名书家李梅庵，有李百蟹之号，这无非夸张他食量之宏罢了。他是汉口路小有天闽菜馆的老主顾，因此有人赠给他一副对联："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原来李有"清道

人”的别号，那联语是非常切合的。李且能绘几笔文人画，有一次，他到小有天去进餐，馆役请他点菜，他默不作声，取了一白纸，把所要的菜肴一一画了出来，嘱馆役照单配制。后来菜馆就把这幅画加以装裱，作为壁间的点缀品。

上海在没有电灯之前，先有煤气灯，俗称自来火，因为煤气管通过地下，故又称地火。那煤气公司，创始于一八六五年（清同治四年），人们叫它地火行，最初设于汉口路，后迁西藏路。

汉口路有一外国公墓，贴近申报馆。当时《申报》巨厦方落成，有人登楼一望，近的公墓，远的黄浦，尽收眼底，于是就做了一联道：“望洋兴叹，与鬼为邻”，那下联便是指公墓而言。公墓中间建有火警了望台，不论昼夜，经常有人了望，如有火警，先敲乱钟，然后以若干响为某地区失慎的信号，使得消防队知道方向，从事施救。后来电话通行，不须敲钟，便移置兆丰花园（今中山公园）南部方亭中，供人观览。

妓院分长三和幺二。幺二是较低级的，门前往往署着堂名，如双富堂、高升堂等，这便是称妓院为堂子的由来。长三称堂，却由四大金刚之一胡宝玉的庆余堂开始。那庆余堂即在汉口路。又名妓蓝桥，在清末助某处路矿一千金，当道因有“花丛第一”之称。当时汉口路荒凉得很，没有市面。蓝桥故意筑香巢于此，一时王孙公子，争趋若狂。荒凉所在，渐成热闹地区了。

沪人有句俗话道：“大舞台对过天晓得”，此话怎讲呢？因为汉口路广西路口，有两家糖食店贴邻开着，招牌都标着

文魁斋，于是彼此表示自己是老牌，别家是假冒，更用赌咒式的标语"天晓得"来自白，绘着乌龟以辱骂。这两家铺子至今尚存在着，但公私合营后，数十年的仇恨，已一旦消除。当时的大舞台前门在汉口路，恰对着文魁斋，后来大舞台前后门互换了方位，把前门开向九江路，所以这句俗话，不经解释，人们便无从知道了。

大舞台有一名旦角贾璧云，以色艺轰动一时。贾又能画几笔山水，结识了一班遗老，遗老有《贾郎曲》揭布报端，且刊《璧云集》，大事张扬，因此有"贾党"之号。和捧冯春航的"冯党"，两不相容，时常在剧评中引起剧烈地争论，这是很可笑的。

四马路的青莲阁

福州路俗称四马路，为旧时最热闹的地区，那中市的青莲阁（在昼锦里口，不是现在湖北路口的青莲阁），楼上卖茶，楼下百戏杂陈，什么西洋镜、小电影、打弹子等玩意儿，应有尽有。每到晚上，妓女纷纷在这儿来来往往，招引那些游蜂浪蝶，所以吴友如画宝有《华众会啜茗品艳》图幅，列为洋场景色之一。那华众会即青莲阁的旧名，韩子云所写的《海上花列传》中一再叙及。该书开头有许廑父一序，仿佛为青莲阁作一个沿革考。其中有云："书中所纪悉当时名人事实，夷考其时，大抵在去今四十年前，以书中无青莲阁，而有华众会，查自华众会改为青莲阁以来，已历四十余年也。闻诸前辈，华众会亦备茶座，附售西式食品，四壁张罗动植物以供观赏。有妓女陆昭容者，芳誉颇噪，天南遁叟《淞滨琐话》，亦载其人。云昭容丰硕浓艳，人比之杨玉环，有声北里。有女小宝，亦以艳名噪一时，诸词曲无所不工。亦能演剧，装束登场，如'卖胭脂'等尤所独擅。旋有赏识之者，以数千金脱其乐籍，其母亦同时嫁人。起初，昭容恒至华众会憩息，为延揽游客之计，果因此而生张熟魏，不暇应接。以后诸雉妓相率效之，遂开青莲阁为雉雏窝之先例。而当时雉妓中有周爱卿者，庸中佼佼，能诗，尝与海上忘机客就青

莲阁赌吟，厥后竟有人为刊诗集曰《绿幺韵语》。有见之者，谓颇多名句也。”在青莲阁一带，不但妓女纷集，且有人在那儿偷偷摸摸地卖秽画淫照，不知害了多少青年。

有绰号野鸡大王的徐敬吾，在青莲阁下层开一书店，专售倾向于革命的书籍，如《自由血》《女界钟》《革命军》《孙逸仙》《黄帝魂》《猛回头》《驳康有为政见书》《扬州十日记》《三十三年落花梦》《廿世纪大舞台》《苏报案纪事》等，有数十种之多。大都出于章太炎、金鹤望、陈巢南、马君武、邹容、陈天华诸人手笔。原来敬吾兼任爱国公学庶务，太炎、鹤望等都往来爱国公学，因此很熟识，可以予取予求的。有一次，慈禧太后庆寿，市上悬灯结彩，且标着“万寿无疆”的颂祷语。敬吾也凑热闹，在书店门前标了“万寿失疆”四个大字，又有一横幅写着“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人们以为触犯忌讳太甚，替他担心事，他却不以为意。他又到处宣传革命，后来被捕入狱，及期满释出，他还借了一套囚衣，到照相馆拍照，以留纪念。

茶馆用晶莹透彻的玻璃窗，以福州路的阆苑第一楼为首创。楼下为弹子房，楼上有广座，有密室。广座卖茶，密室专供瘾君子吸鸦片烟。后来因为茶客太杂，一般较有“身份”的裹足不前，生涯也就日益衰落了。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称：“同治间至沪上小广寒听翠娘歌。”小广寒为福州路上一家极老的书场，此外尚有天乐窝、颜玉楼、满庭春、桃源趣、四海论交楼、响遏行云楼，都是聘歌妓来清唱的，和现今听评弹的书场不同。那些红妓女且有熟客捧场点戏，一出连一出地点着，每点一出，酬以一元，

柳亚子与陈巢南、高天梅所发起的南社，是继续明代的几社和复社，提倡正气，发扬文艺的组织。后来社友散的散了，死的死了。记得最后一次聚餐会，是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晚上，恰为旧历元宵，在福州路石路东同兴楼举行，虽大雪纷飞，参加的却有一百五十余位。除亚子伉俪外，尚有阎甘园、胡寄尘、陈匪石、陆丹林、陆澹盦、马公愚、范烟桥、陈乃乾、林庚白、江红蕉、易大庵、郁曼陀、简琴斋、朱少屏诸人，胡朴庵也出席，把他所作的《奈何曲》分赠友好，多牢骚愤激之语，原来是对反动统治有感而发的。如云："昔归玄恭作万古愁曲，自盘古以来，人人皆可骂之人，事事皆可骂之事，此所谓无可奈何之日也。讵知世变日急，纵的可骂者，玄恭悉已骂之矣。横的可骂者，玄恭初未尝一遇之。玄恭虽处无可奈何之日，犹有可以奈何者也。今日真是无可奈何之无奈何矣。目有见，见之无可奈何也；耳有闻，闻之无可奈何也；口有言，言之无可奈何也。无可奈何而病，神昏昏其若迷，心耿耿犹有识，汗下如雨，悠然而醒，四肢萎顿，卧床旬日，病而不死，更唤奈何。辗转反侧之间，聊为此曲，以纾予愤。"那天共设十四席，盛极一时，亚子的《南社纪略》一书，曾记此事。

说起同兴楼，这是素负盛名的京菜馆。有一年，日本皇室曾派厨师来沪，向该馆名厨学习烹调，每煮一味菜肴，学习的用手表记录着需要的时间，又用温度表测量着需要的温度，满以为这样便能掌握烹调技术了。岂知回国如法炮制，却很不可口。原来名厨制肴，不但时间温度问题，且作料配搭，以及运用铲勺的手法，种种都有关系。日本人只知

其一，不知其二，不能灵活运用，毋怪不能获得良好的成绩了。

福州路有丹桂第一台京剧院，曾排演时装新剧《杨乃武》。杨乃武本人恰巧在上海，便亲自去观看，饰杨的角儿尚合分寸。饰小白菜的是月月红，春情冶荡，作态弄姿，观众报以满堂彩。可是杨本人认为太胡闹，和事实不符。听说后来丹桂主持人也知道歪曲了剧情，亲访杨乃武，请他自来编排，实则无非借此号召。杨乃武没有答应他，也就作罢了。

科学仪器馆，也是福州路上的老店。创始人是镇海锺观光。他字宪鬯，多才多艺，能做桐城文，精许学，又解声光化电以及地理博物，曾在龙门师范学校任课。他且一度赴日本，瞧见许多科学仪器，便购置若干带回来仿造，科学仪器馆就是这样开始的。他又仿造了蜡纸油印机，各学校纷纷采用，编印讲义，大家称便。

仓山旧主袁翔甫，他是袁子才的文孙，任申报馆编辑时，便就近于福州路胡家宅辟"杨柳楼台"，门前种了几株垂柳，随风飘拂，饶有画意。室内罗列了盆栽古玩，书画琴棋，他常和一班风雅朋友，吟诗饮酒其中，很有兴趣。后来一再易主，诗妓李苹香且在这儿应客，《九尾龟》说部曾叙述这一段事迹。又过了相当时期，李公朴的丈人张小楼借设书画公会于此。

戏院密集的五马路

广东路是外国人初筑马路之命名，国人都称之为五马路，也叫宝善街。其中间一段又名正丰街，原来正丰是家酱园招牌，用这家酱园作为街名罢了。上海之有电话，始于一八八二年（清光绪十九年六月）。设南北两局，南局在十六铺，北局便在正丰街，后因经费不足而停业。过了一年，才有徐家汇教堂通线至英、法、美租界，以报风雨寒暑。从此各界人士渐渐感觉电话的便利，次第装用。其时电话称"德律风"。

从前戏院密集在广东路的，有一桂、金桂轩、天福茶园。当时老伶工汪桂芬在天福演剧，但他每逢星期一、二、四、五，往往拒不登台，原来他认为这几天是忙日，人们工作紧张，观客较少。但有某名角却故意逢这所谓忙日登台，表示忙日能卖座，正足见他号召力之大，汪桂芬也就自己打消旧例了。

清末，柳亚子和朱少屏发起《铁笔报》，用以抨击当局的腐化政治。报馆设在广东路三十九号，想请景秋陆当总编辑。这时秋陆在日本，等他从东京回来，便出创刊号，岂知秋陆始终没有来，而武昌革命爆发，该报也就作罢了。

一称报馆街的望平街

望平街虽只短短的一段，在从前却为报馆汇集地，所以有报馆街之称。如洞庭山席氏所办的《新申报》，大有取《申报》而代之的野心。又如和《申报》、《新闻报》鼎足而三的《时报》，特在望平街福州路转角处建一浮图型的崇楼，很引人注目。隔壁的有正书局，也是《时报》主人狄平子所办的，所以最初时报附刊《余兴》；对于写稿者不付稿费，大都是赠送有正书局的书券。其他如《大共和日报》、《中华民报》、《天铎报》、《太平洋报》、《民强报》、《时事新报》、《民国新闻》，毕倚虹手创的《上海画报》，鼓吹革命最激烈的《民立报》（经火灾后迁往三洋泾桥），为袁世凯帝制张目连吃两次炸弹的《亚细亚报》，民族性质的《回民日报》，资格很老的《神州日报》，以及从《神州日报》蜕化出来的《晶报》，都设在望平街。那时候的报纸，每逢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纪念日，各家都要增刊到五六张甚至十余张不等。为什么要增加这么多呢？这是因为趁此时机，可以吸收大量广告，那笔广告费是很可观的。报馆方面乐得弄些不痛不痒的作品，和广告混合着撑满篇幅。这天的报纸批给报贩是不加价的。可是报贩却奇货可居，获得额外的利润。所以在前一天，报贩特别拥挤，把整个望平街塞断了，车辆都须绕道而行。那些报

贩都在这儿等待增刊报纸的出版。他们为便利分发起见，特自己出钱，在各报馆门前装着大电灯，光照路衢，如同白昼。

醉沤居，是何等隽雅的市招啊！这是家酒菜馆，设在望平街中市，为蜀人王秉恩所开设。秉恩字雪澂，清末任广东臬台。富收藏，又精鉴别，能诗，又擅书法。著作有《平黔纪略》二十卷，《强学簃杂著》若干卷。记得当时醉沤居门上有一嵌字联语："人我皆醉，天地一沤"，就是他老人家的手笔。

清末有盐城人底奇峰，曾开设一刻字铺于望平街南口，招牌为"新世界"，刻售日本牙印及玻璃章，生涯尚不恶。奇峰因醉心革命，得识几个党人。当辛亥革命时，党人谋光复上海，要镌刻图章，许多刻字铺因清吏逮捕革命党很严，万一事发，恐被株连，不敢承接。底奇峰却当仁不让，慨然应允。但他不敢彰明昭著地刻着，等到夜深，伙友都熟睡了，才偷偷地在灯下奏刀。上海既悬白旗，陈英士设立沪军都督府，他常出入都督府，后来孙中山返国，推举为临时大总统，莫都南京。总统府中设有镌印局，陈英士竭力保举他，于是他一跃而为总统府镌印局局长。有一天，他跨马出游明孝陵，不料马失前蹄，他从马上坠下，头部触着一块大石头，血流不止，不及医治而死。孙中山赠赙仪一千元，派卫队护送棺木回沪，并赡养他的家族，且入祠杭州西泠印社。汪洁肤为他作传，刻在遗像后面，以为纪念。

新闸路的辛家花园

新闸路因新闸桥而得名。所以称新闸，是别于老闸之故。老闸建于前清康熙十四年，雍正初又就其西建新闸，历史也很悠久了。新闸路泰兴路口，大家都称为辛家花园。后来却徒有花园之名，没有台榭树石之胜，和张园、愚园都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这辛家花园，从前归巨商辛仲卿所有。仲卿晚年营业失败，那个司会计的，又侵蚀了数十万元逃跑。他没有办法，便拟出售该园，定价六万元，然一时难得买主。原来这一带都是田地菜圃，绝无市面，于是异想天开，发行一种奖券，共六万张，每张售一元，得奖的即为园主。辛仲卿有熟友某甲，合伙集资，购券五百张，和辛仲卿相商，俟开彩时为偷天换日之举，使得奖的号码在五百张中。后来开彩，果得如愿。然某甲等待用急迫，时盛宣怀为东南财富巨擘，某甲等便把该园以廉价让给盛家。盛家买下了该园，便在园的前门建造西式楼房，用以出售，楼房后面有一大荷池，依旧未加改筑，那些水榭曲廊，更宜夏日消暑。南海康有为曾一度居住过，据云《广艺舟双楫》一书，便在这儿写成。盛宣怀的夫人信佛，僧人求布施，夫人把园地舍给僧人，盖造佛殿，才成清凉禅寺。

辛家花园的西面，有一私人医生，门前挂着一块狭长的

招牌，上有"发愿接生八万六千众不收接生费"十四字。大家觉得很奇怪，认为他的发愿，大有龚定庵"发愿欲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结尽燕邯侠子"的气概。但有人替他推算，人生百岁，也只有三万六千日，就算他医术高明，手法敏捷，也接不了这许多的生，大约这愿要和愚公移山般，死而有子，子又生孙，经数代之久，始得偿愿哩。后来那医生不知出了什么乱子，给法院把门封了。总之，旧社会的怪现象，诸如此类的很多，这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双清别墅

现在的康定路，旧时称康脑脱路，徐仲可曾经居住在那儿。他认为我辈文人运用脑力，"脑脱"二字太为不祥，所以他写信给人，总把自己的地址写为"康瑙脱路"，用"瑙"字来替代"脑"字。他的"康居随笔"，就是在那儿写的。

康脑脱路有一徐园，该园原筑于一八八六年（清光绪十二年），地点在闸北唐家弄，又名双清别墅。到了宣统元年，园主徐鸿逵的儿子把园迁筑到康脑脱路来，但一亭一榭，一泉一石，都仿着旧制，仍保存着十二景，有"草堂春宴""寄楼听雨""曲榭观鱼""画桥垂钓""笠亭闲话""桐荫对弈""萧斋读书""仙馆评梅""平台眺远""长廊觅句""柳阁闻蝉""盘谷鸣琴"。南社同文常在这儿雅集，诗酒风流，当时传为盛事。据徐半梅告诉我，上海最早的一间托儿所，即借该园一部分屋舍经营的。抗战军兴，该园曾一度充难民收容所，又办过小学校，泉涸楼倾，墙坍石倒，不久完全改为市廛，没有些儿遗迹了。

下　编

戏园为什么称茶园？

戏园有一个时期，称做茶园。这个时期很长——从清朝咸丰三年起，到上海改造新式舞台止，其间约有六十年光景。为什么戏园在这一时期要称做茶园？此中是不无缘由的。

上海最早一家戏园，名三雅园，大约是在上海开埠(1842年)后不久创办的，地址在城内县前街。那时城外还没有戏园，所以，当时梨园新演春灯谜，城外人总向城内跑。后来上海又开了几家戏园，如满庭芳、聚美轩、丹桂轩等等，都不称茶园。茶园二字是从外地传过来的。

咸丰元年，只因道光皇帝死了，百姓要带孝三年，叫做"国丧"。这"国丧"期间，民间不许登台演剧。为了这个死皇帝，全国的梨园行，要完全失业三年。那些唱戏的人，从小学了戏，别的事业做不来，又不会改行，所以全靠借贷度日，甚至饿死的也有。当时昆剧盛行，戏班尽是昆戏班，那些

唱戏的，又全是苏州人。在苏州一地，就有好几千人几乎饿死。幸亏苏州有一个叫做钱文元的，他把昆戏改为清唱——不登台扮演，一律坐唱。废止锣鼓笙管，改为胡琴琵琶。并且把曲子改作七言唱句，而说白完全仍照昆戏，算是"唱滩簧"。如此，一来官场可以不加干涉，二来就此维持了一班梨园中人的生计。因为这滩簧乃钱文元所发明，与原有的滩簧不同，所以称它为"钱滩"。后人误作"前滩"。这是因为附唱在末后的小戏，称为"后滩"，因此，把正戏当做"前滩"了。

这样把梨园中人的生活，暂时维持了两年。到了第三年，即咸丰三年，苏州的梨园中人就打算要开戏园了。他们说："我们父母之丧，泣血三年；其实，带孝只带两年零两个月。满了两年两个月，就要除服。我们汉人如此，不晓得满洲人的规矩怎样？是否一定要实足三年？还是两年零两个月就可以了？"这一个问题，却是不容易解决。老百姓又不能到衙门里去问问，还怕一问，反而弄僵。于是有个聪明的人出主张："我们不妨就把戏园开门；但门口不用戏园的名义，牌子上写'某某茶园'，对于官场，只说是吃茶的地方，而里面尽管袍笏登场，笙歌盈耳；我们再在衙门前用一点小费，来一个掩耳盗铃之计，想必高高在上的老爷们也不见得会认真计较的。"

这一个办法，大家赞成，就有大胆的人，出来尝试。某某茶园的牌子挂了出来，里面台上，仍旧跳加官演起戏来，民众当然欢迎，官场也不问不闻。这第一家茶园成功了，于是第二家茶园第三家茶园接踵而来，一切毫无问题。

上海的第一家戏园三雅园，设在县前街顾某房屋中。顾

某原是上海巨族，戏园由住宅改设而成，屋为沿街八扇门的高平房，进门入室，有小型花园，花木扶疏，假山纵横。戏台建于大厅中，池子内陈红木椅桌。当时上海适值小刀会刘丽川揭竿起义，进攻县署，三雅园虽邻近县署，并无影响，小刀会并且保护着戏园，照常开锣，不管什么国丧不国丧，还是天天唱戏。

后来租界上出现了第一家戏园，就是满庭芳，在五马路（今广东路）。至今广东路有满庭芳的地名，便是那时戏园的所在。而小东门外，因商业兴盛，开了两家戏园，一家叫同桂轩，另一家也叫三雅园。因县前街的老三雅园，已被烧掉了。

同桂轩开场不到一年，因营业不振，便改名红桂茶园，这是上海戏园第一家称茶园。戏园称茶园的风气，已由苏州传过来了。其实此时国丧期已过，也没有用茶园的必要了，不过茶园二字很时髦，大家就不妨学学。到光绪八年，红桂茶园又改为丹凤茶园。

石路（今福建路）上的金桂轩，也在光绪十年改称金桂茶园。

宝善街（即广东路）有大观茶园，后来改为咏霓茶园，以后又改为咏仙茶园。总而言之，从咸丰三年以后，上海新开或改建的戏园无一不称茶园。这与"国丧"事件，已经毫无关系了。

上海戏园，本来每逢皇帝忌辰，照例也要停演一天，但也有个变通办法，只停演日戏而不停演夜戏。因为外地戏园往往每天下午三时开戏，演至晚上七时光景，每逢忌辰，

都停演一天。上海则不然，以夜戏为主，所以在忌辰的一天，倘有日戏，那末，门口挂一块牌子，写明："今日忌辰，日戏停演。"但夜戏照常，虽在租界上，但对于死皇帝，还是给他一点面子的。

在辛亥革命前后，上海的戏园都争取改建新式舞台和新式戏园，这样把建筑物一改变，名称也就改变了。于是新舞台、大舞台、新新舞台、天蟾舞台、第一台、共舞台、歌舞台等名目，又形成一种风气，好象不用"台"就不成戏园了。茶园二字，方始消灭得干干净净。

传唱堂戏的苛政

清朝时候，北京的戏班，常被宫中传去演唱。因为西太后爱听京戏，除在宫中南府里专门训练一班演唱皮簧戏的太监，特地建造几座戏台外，还不时召唤一班外间技艺精湛的名艺人，如谭鑫培、孙菊仙、王瑶卿、杨小楼等，进宫演唱，名为供奉。于是京中戏班，便时常要被传到宫中去唱戏了。这是一个苦差使，倘若不懂得宫里规矩，冒犯了西太后，其罪不小。

北京之外，也有官场传当地戏班演唱堂戏之举；但照例是要在有织造的省份，才有这规矩。因为戏班属内府，归织造管理。江苏省有两个织造衙门，南京、苏州各一，所以江苏省内也有官场传唱堂戏的事。当时上海是江苏省的一个县，因此上海也常有官场传唱堂戏的习惯。

什么叫传唱堂戏呢？就是官场中只要下一道命令给戏班里，说："明天传你们到某处去唱堂戏。"这戏班就不能不去。这种唱堂戏，完全义务当差，远处还要自己贴车钱，文武戏班，辛辛苦苦地去演唱，而一班老爷们却老着面皮看白戏，不必破费半文。有的并非自己欣赏，还把戏班送给他人，譬如上司有喜庆寿事，下属便传一个戏班去唱戏，算是送了一份礼，孝敬上司，却叫人家去尽义务当苦差；不过那

受礼的人，对于戏班倒还有一些赏钱，但数目是极微的。还有更糟糕的，是那官儿自己要消遣或请客，去传一个戏班来唱堂戏。有时老爷发脾气，对于所唱的戏不满意，还得要罚。尽了义务当差，再要罚，这不知从哪说起。有一次，有位传唱堂戏的官儿，对一个武生不满意，认为他不卖力，便勃然大怒，把班主叫去训斥了一顿，说："那武生好大架子，瞧不起我，我今天非叫他再连唱十出武戏不可。"那班主连连求饶，试想：一个武生，倘使真的要罚他连唱十出武戏，他一定会血管爆裂，死在台上，就是其他的武行全体，也决计不能连唱这么十出戏的。后来那班主叩头求饶，总算那官儿高抬贵手，十出武戏，打一个三折，答应他罚唱三出，才算了事。

总而言之，传唱堂戏，是个苦差使，戏班里往往叫苦连天，唱一台戏，至少要动员七八十人，个个都是当差，还要贴车钱。无奈清朝的专制政府，把一般艺人都当奴隶看待，真是苦痛万分。万一逢到老爷们发脾气，看了白戏还要向戏班寻事，那就更倒霉了。

戏班受尽了这种苦，要想翻身也没力量。上海又是戏剧兴盛的地方，戏剧界中人对于这传唱堂戏一事，非常不满。后来有一位艺人夏月恒，做了两江总督端方衙门中的武巡捕，他还没有忘本，就在端方面前替艺人诉苦，端方同意了，便下令给织造，停止传唱堂戏。这才把江苏省传唱堂戏的习惯取消了。

江苏省传唱堂戏的习惯取消后，接着新舞台的一般艺人就不再用艺名而用真实姓名了。例如七盏灯改称毛韵珂，

小子和改称冯子和，夜来香改称周凤文，小保成改称邱治云，赛奎官改称夏月华等等。牌子上，戏单上，焕然一新。新舞台如此，其他舞台也仿效起来了。

《大三上吊》的惨祸

上海在一九〇〇年以前，戏园生意并不怎么发达，所以戏园关门改组是常有的事，往往有人在戏园生意清淡、风雨飘摇之际，乞灵于《三上吊》一剧，拿来做一贴强心剂。因为一唱三上吊，必定可以满座，连唱几天，赚得一些钱，可以使老板透一口气。

《三上吊》本来是一出武丑戏，所演都是惊险动作。不过戏班里演《三上吊》，都不肯过于冒险，只做到适可而止。于是外面有人练得一身好武功，自愿到戏园里来客串，表演起来，其惊险程度比戏班里的武丑高出数倍，所以称它为《大三上吊》。因为表演技艺高超，无怪会夜夜满座了。这《大三上吊》，虽从舞台上开始，但后来表演各种惊险武艺，都不在台上，他们嫌台上地位太小，往往都在正厅上面的空中绳索上做功夫，一切动作都在空中，所以格外觉得惊人了。

照例，戏园中表演这种惊险动作是不可以的，因为太危险了。无奈当时租界里面对这些事非常马虎，巡捕房虽在各戏园内派有巡捕，但只是专管观众吵架的，其他一切不管。租界当局，只要戏园不欠他的捐钱，台上有些什么举动，他们是漠不关心的。

有一年，咏霓茶园改称咏仙茶园，那时虽名角如林，无

奈生意没有起色，只有演《大三上吊》了。他们请来了一位客串武丑，名叫云里飞。此人练杠子武功出身，一向有名，大家叫他"杠子阿鹤"。他还有两个徒弟：一个叫空中飞，一个叫辫子飞。师徒三人，便凑成这一出特别三上吊。他们登台卖艺，表演空中飞人，惊险万状，观众每夜满座，这样一来，使得奄奄一息的咏仙茶园，延长了不少时日的寿命。

于是继起的也来了。天仪茶园的主人也觅得一位擅演《三上吊》的名角，此人叫云中飘。他们大事宣传，说本领比云里飞更强，于是又轰动一时。登台之夜，座无虚席。云中飘出场，从包厢外楼口一跃登绳，疾如鹰隼，博得满场彩声。从绳上猱升至正厅屋顶横梁，置双手双足于绳圈内的木杆上，演出种种技能，身轻如燕，敏捷如猴，本领确是不错。

于是《大三上吊》，大大吃香，确是挽救了戏园的生命。其时另有一家满仙茶园，正在难以维持下去，因而用重金去聘请云里飞来演出。师徒三人，答应登台，果然获售满座。所演技艺，与上次在咏仙茶园时差不多。那徒弟辫子飞，又增加了一种新的空中玩艺，乃将辫子挂在一把铁钩上，悬于正厅屋顶上面，使身体四面脱空，然后表演打拳，这叫空中打拳。还有二人彼此推动，宛如荡秋千，叫做空中搬家。有一天晚上，因设备上有缺点，钩子忽然一脱，辫子飞跌将下来，正跌在正厅内一只空椅子上，先把椅子背上的横档打断；椅子背上一根木柱恰似一把尖刀，把辫子飞的胸部刺穿。可怜辫子飞就此一命呜呼。

这件惨案发生以后，工部局方始借口危险，禁演《大三上吊》，那正在危乎殆哉的满仙茶园，也跟着关门了。

人间地狱话"群仙"

有一个名小丑李毛儿，他训练了十几个女孩子，专应人家的喜庆堂会，每次唱四出戏，如《二进宫》、《武家坡》、《查头关》之类，都是角色不多的戏。这叫做"毛儿戏"。后来生意发达起来，效尤的人也多了，就有咬文嚼字的人替她们改称为"髦儿戏"。其实女子唱戏，在李毛儿以前早已有了。太平天国之前，在昆剧发达的苏州等地就有这种组织，不过没有什么名称，混称女班戏罢了。上海这种髦儿戏一发达，当然其中会有几个名角出现。那末，她们为什么不到戏园中去搭班子，正式登台，而老是唱唱堂会呢？其中却有个缘故。

因为公共租界上，有一个蛮而无理的规定：凡是中国人的戏园，禁止男女合演。本来在舞台上，以男扮男，以女扮女，这是各国的通例。而当时上海的巡捕房偏偏违反这通例，禁止中国男女合演戏剧。在男戏班中，只能以男代女；而女戏班中，也只能以女代男。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规定？连巡捕房自己也说不清。所以实在是蛮而无理。因此，各戏园中旦角都是男伶；而这髦儿戏班中，凡一切男角都由女伶扮演。为了这个缘故，当时髦儿戏班中虽然出了几个很红的旦角，也决不能搭入男班中，来一下男女合演，只好分清

界，绝对不许通融。

但是矛盾的事情也相当的多。象英国人造的兰心大戏院，在一八六〇年就落成了，本来在博物院路香港路附近（迁到长乐路，是几十年后的事）。那时有一个 A、B、C 剧团，是外国侨民组织的，在兰心大戏院上演话剧，他们却是男女合演的。每年总要大规模地演三四次。他们自己可以男女合演，而对中国人却要禁止男女合演，这真是岂有此理！

从前上海的各中国剧团，尚未实行包银制，往往一个艺人可以兼唱两家或三家戏园，只要预先把时间安排好，就不会有冲突。在赶场时间太局促时，往往在这一家戏演完了，不必卸装，就此雇一辆人力车赶赴第二家后台。这样一来，可以把洗脸化妆的时间省掉，面孔上修饰一下，就可以登台了。至于行头，角儿们都是自己的私房行头，更换尤其便利。这样的乘车子赶戏，当时非常普通，不料有一天星期日演日戏，花旦小双凤（即汤双凤），他扮了一个时装女子，乘坐包车到另一家戏园去赶戏；车子经过四马路四时春点心店门口，竟被巡捕捉去了。关了几个钟头，后来罚洋了事。他的罪名是男扮女装。这件事情更引起戏剧界的不满。既然不许男女合演，只好用男伶扮女角。那末，男扮女装为什么又犯了罪呢？好在巡捕房干的事，不必讲道理，他要罚就罚，他要关就关，中国人是无法争辩的。自从小双凤捉进巡捕房的事情一传出，各戏园的艺人就不再一人兼唱两家，也不再乘车子赶戏，各家都实行包银制，把角儿包定了。

在一九〇〇年光景，正式开了一家毫儿戏戏园，名叫群

仙茶园，在四马路（今福州路）广西路之东，门面坐南朝北。前台老板童子卿，是巡捕房的包探头目，当然很吃得开。后台雇用两副班底，一文一武。此外，还有几个退伍老妓，如林黛玉、翁梅倩等，也搭入该班。还有艺人世家的女孩子，如周五宝之妹小来全等，也在该班，这都算是客员，不受该两班管束的。至于那文武两班的班主，不用说，都是头号大流氓。他们任意摆布着这一班只吃饭而不拿工钱的摇钱树。这些女孩子，都是由拐匪拐来卖给这班主的，完全是一群小奴隶。把她们教会了戏，每月班主可以整批向前台领包银，而只消供给她们吃饭穿衣住宿好了。这一群可怜的女孩子，与《黑奴吁天录》里的一群奴隶，生活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她们上午在班主家里学戏练功，要下午才到戏园里去。戏班里教徒弟，本来不懂得什么教授法，总括一句：唯一的好方法，就是打。可以说无人不打，无日不打。就是有父母的子女们请老师教戏，老师要打，父母也不能说什么话，何况这是一班没有父母的女孩子呢？当然叫天天不应，打死也无人问。

她们吃过午饭，由班主领了到后台去。一踏进门，班主就对看门的人说："我们人都到齐了。"意思就是说：你门户要当心；万一逃走一个人，要你负责的。因为受不起苦的女孩子往往想逃出火坑，自寻生路，这是常常有的。所以后台如监牢，谁都不容易出进。这样日戏完了，接演夜戏，要夜戏完了，到十二点钟以后，才由班主领了全体人马回去。

演戏时如有错误，那末，等这出戏完了，一定挨一顿毒

打。打起来，不但用鞭子抽，用棍子打，而且要自己先把身上的衣服统统脱干净了，那班主的老婆才肯动手打。为什么呢？因为她不打则已，一打，非打到尿粪齐流不可。脱光了衣服打，可以不致弄脏衣服，省却了洗衣服的麻烦。那武班的班主姓石，他老婆打起来，手段更辣。一班女孩子都叫她"妈妈"！她哪里是一群女孩子的妈？简直是活阎王！

在挨打的时候，其他女孩子都不许流一滴同情之泪，万一有人流了泪，石家老太婆就会打一个满堂红，这是石老太婆的法律。

有一次演《花蝴蝶》，那武生打算去小便，但时间来不及，而且打扮好了，解开裤子去解手，非常麻烦，于是只好忍一忍，等有空的时候再说，不料这武生上栏杆的当儿，她小肚子一用劲，忍耐不住，小便出来了。观众们看见了，一个个笑不可抑。不用说，这出戏是完了，那武生心中明白，所以自己先脱光了衣服，等候石老太婆动手。石老太婆因为她在台上当众遗尿，认为丢了班子里的脸，自然打得更毒。打到了尿粪齐流，还要来一个皮开肉绽。那女孩子身体在地上打滚，口中"妈呀妈呀"地乱叫。她一个不留心，忽然叫了一声"亲娘呀！请救救我吧！"其时石老太婆一听得"亲娘"二字，大触其怒，打得更重，叫道："看你的亲娘能够来救你么？"这一顿毒打，竟打得这女孩子体无完肤，躺了三天才得起床。

总而言之，这一家戏园，外面挂的牌子是群仙茶园，台上是笙歌盈耳，而那班女孩子却过着地狱般的苦痛生涯。哪里象是群仙呢？

若问那时候当班主的人为什么敢这样毒辣地虐待这些孩子？那还不是因为他们都有恶势力做后盾的缘故。再说得明白些，当时整个社会制度都是支持他们的。

戏园中的隐名资本家

过去开戏园的老板，原来个个都是穷光蛋，他们没有资本，只凭恶势力。有了恶势力，就可以开戏园。上海的戏园，最初开在南市时，戏园老板都是些衙门中人。后来开在城外租界上，又都是些巡捕房中人物，或包探之类，以及大流氓等等。他们都会做没本钱的生意，只要你租下戏园的房屋来，一声传出去，某人要在某个地方开戏园了，于是资本就会送上门来。第一，就是案目，亦称案马。每一个案目，必须先纳一笔押柜费，假定一家较大的戏园，可用二十名案目的话，每名纳押柜费四百元，那末，老板就可以先拿到八千元了。他拿了这八千元，就可以发后台的包银。发了包银，最大的开销便已经付清了。其余还有茶壶手巾一项，拿去卖给人家做，也可以得到一笔大款子，假使不卖而自己做(茶壶手巾，进帐极大，往往不肯卖掉的)。那末，每一个茶房，也可以收他们若干押柜。这又是一笔大款子。此外还有水果摊、糖果摊可以出租给人家，又可以拿到一些巨款，而且出租的话(茶壶手巾亦然)，经常更有租金可得。这样的几项大进款收下来，一个光棍，对于这戏园的开办费，就可以应付了。他自己不必拿出半文钱，居然神气十足地做起大老板来了。

案目，实在是一个小资本家的集团。那末，做案目到底有多大好处呢？他们不过招揽几位熟客进来看戏；或是引导几位生客入座，他们的正当收入，是每一张票子上可以拿一个九五扣，就是他向账房里交账时，只消九五折算账好了。应交一百元，只要交九十五元，他有五元好处。数目似乎不大，不过核算起来，倒也相当可观。比如今天卖一千元的话，就可得五十元。这个月卖三万元的话，就可得一千五百元。换一句话说，就是戏园子里要吃亏一千五百元。那末，戏园子里如果不用案目，岂不是每月就可以多收入这许多钱么？难道不用案目就不会有观众上门么？不用案目，虽然不会绝对没有人来看戏，而多数的观众都被别的戏园吸引而去，影响不会不小，况且一笔开办费，完全拿案目的押柜来做抵挡，老板靠他们的地方多着呢！

至于案目自己的进账，他除了戏票上的九五扣之外，外快很多。比如客人要吃点心的话，由案目去叫来，价钱虽然一样，而案目向点心店算账时，他也有一个九五扣。此外，还有装盆子，当然更有好处。他们对于大户，如公馆中的太太奶奶们，或者客帮的大商家们，往往不一定当天付款，可以欠账。而案目也不一定第二天就去收账，他总要隔三四天，或者积了三四趟一起去收。这样一来，他的账就变成了花账。连看了三次，一共十八客的话，他就说是二十客，人家早已忘掉，当然不去跟他计较了。有些阔气的人，看他很殷勤，便特地多给一点，也是有的。而他们的奉承功夫，真有出神入化之妙。比如一位少奶奶带了一个抱在手里的小孩去看戏的话，案目会买些糖果给小孩吃。第二天，案目还

会买若干馒头、两支安息香，去问问："昨夜小宝宝看戏，听了锣鼓声，有没有惊吓？"这些费用，虽然不能开账收款，但总是会"明里去暗里来"的。他们大有"骗死人不偿命"的本领。还有太太们如果带了娘姨大姐去看戏，案目往往会请娘姨大姐们吃点心，每人一碗火鸡面，吃得娘姨大姐笑嘻嘻。但这一碗火鸡面的钱，决不白花掉，倘使下一次太太要到别家戏园去看戏，娘姨大姐就会提供意见，说别家戏园不好，还是这家戏园好，这家戏园的案目侍奉得怎么怎么周到。其实，她想起了一碗火鸡面，不得不暗中帮帮案目的忙了。在冬天，太太们到了戏园中，如果把大衣脱下来交给案目，案目先要问一声："袋袋里有没有皮夹子等重要东西？"到散戏之前，案目把大衣交还太太时，说道："左面袋袋里有一块手帕，我已经另外藏好。账房间里大衣有一百多件，万一被人摸了去，那是我有责任的。"他说罢，在自己身边摸出一个纸包来交还太太。纸包里面当然是一块手帕。他们这样地侍奉周到，太太们自然满意。下一次看戏，就不肯到别处去了。花一些小钱，也就不在乎了。

每逢在新角儿登台的前三天，或新戏登场的前一天，案目便会找上门去说："太太！这一次，位子都早已订空了。我怕你得不到好位子，所以已经在正厅前面第五排顶好的地方，替你订好了八只位子。"如果这位太太本来有事，不想去看戏，被他这么一来，也只好去应酬一下了。案目的一张嘴，能说得天花乱坠，面孔上连眉毛都会说话。看了你的面色，就会知道你的心事，使你不能不佩服他们的本领和机智。

每年生意最清淡的时候，案目有打野鸡之举。这是在夏天或年底，打野鸡就是打抽丰。他们先与戏园方面接洽，包定三天或若干天，预备他们打野鸡，这包戏的价钱，只算开销，不算赚头。戏园方面只求保本，比如每天开销五百元的话，就由案目包去，三天工夫，一共一千五百元，由案目付款。所演的戏可以由案目指定。案目自己去印戏票，假定本来有一千个座位的话，他们竟会印一千两三百张票子。他们拿这票子去分散给客户，说是"某日，请你们府上各位去看戏，我有十五张戏票在此。"于是客户就说："十五张太多，这几天没有工夫，给我十二张吧！"这样一来，这十二张票子无论有没有人去看戏，钱总是要付的。这样的打抽丰，自然十足客满。有的人家往往自己不去，由几个娘姨大姐陪了小孩去看看热闹，十张票子去五个人，也就算了。案目们还要在包厢中铺了台毯，供了花，装了盆子。这些都是节外生枝，当然都得花钱。

案目是吸血虫，又是太上老板。因为他们可以左右老板的行动。比如老板要去邀请北京的某角，而案目一致反对，老板只得作罢。有时案目竟要求："必须向北京去请某人某人，一定能够卖钱，我们很有把握。"老板也只好勉为其难。万一老板不答应案目的要求，案目们竟会提出全体告退的要求，老板听了，顿时会吓得哑口无言。因为全体告退，势必要把全体的押柜付还他们。试问：这笔款子，早已用得干干净净，他哪里拿得出？所以只有屈服，别无他法。

十六铺新舞台开门，便废除案目，实行卖票制，无奈一班观众都不习惯，以致颇受影响。后来只好仍旧用案目，不

过对付的方法有些不同。新舞台是股份公司，有相当的资本，并不想利用案目的押柜。不过案目出入银钱很多，押柜不能没有。于是他们把这押柜款子全部存入银行，决不移用半文，万一有时案目们有什么要挟，要全体告退，他们一点不怕。要提押柜，悉听自便。除了星期日，每天可取，案目们晓得他们有准备，所以也不敢耀武扬威做太上老板了。

案目中也有由两个人合做的。一个出资，一个办事。好比一个资方，一个劳方。资方出钱雇用劳方。票子上的九五扣，归资方所得；而劳方除拿工钱外，一切外快也归劳方所有。这样的资方，甚至一个人可以做三四家戏园的案目。他四面放资本，坐享其利，他手底下只消雇三四个伙计好了。

案目中很有几个"杰出"人物，暗杀魔王应桂馨，就是五马路春仙茶园的案目出身。

妓女与洋人喝的绿茶碗

当上海买办阶级初露锋芒的时候，社会上一般的人都瞧不起他们，骂得他们是帮外国人销洋货的走狗，把中国金钱送往外国去的坏人。看见菜馆中戏馆中都是他们的市面，更令人侧目。大家心中愤愤，恨不得报复他们一下。他们每夜在戏馆中看戏，还要叫局，有时更阔气，索性请妓女来看戏。于是戏馆主人定下一个规则来，凡是妓女坐下来，不论出局还是请来看戏，戏票都要加倍算账。而且在园内各处柱上贴着"妓女加倍"字样。好在买办们都是洋盘，多花几个钱也不在乎，钱花得越多越是显得阔气。而戏馆方面，总算对于这一班洋奴，小小地警戒了他们一下。

不料买办们索性请洋人到中国戏园中来看戏了。洋人本来不懂什么中国戏，无非是洋奴孝敬主人罢了。戏园方面见他们变本加厉，便再来一个洋人戏票加倍，叫买办再加重一些负担。

妓女、洋人戏票价钱不同，招待必须有个区别。普通观众都用白茶碗，独有妓女与洋人一律用绿茶碗，以示区别。收钱时，照茶碗算戏票。这样虽然分得清清楚楚，但争执的事情也还不免。

特别是那些从外国回来的留学生，船一到上海，往往当

夜就要去看戏，不料走进戏园坐定后，送上来的也是绿茶碗一只，收起戏钱来，要加倍算账。与之理论，则回答道："你看！明明写着：洋人加倍。"于是来者生气道："我是洋人么？放屁！"戏园的人便说："我们也无暇来细查谁是哪一国人。总而言之，你穿了洋装，我们就当你洋人算账，没有二话可说。"这样的争执，可以说是常常有的。因为留学生一天多一天，弄得天天吵之不休，戏园方面也觉得不是好办法。本来是抵制买办阶级的，现在牵连到本国留学生，未免有些说不过去，但又不肯取消这一条规定。

后来有家戏园想出一个妙法，他们把"洋人加倍"改为"洋装加倍"。遇到留学生不承认是外国人时，便对他说："我也晓得你是中国人，我们的规定是洋装加倍，不是洋人加倍，请你不要误会。"这样一来，加倍还是加倍，那客人就不能再唠叨什么了。

不过后来留学生也有经验了，他们一到上海，要去看戏的话，便先去找亲戚朋友借一件长衫来穿，任你坐在正厅花楼，决不会再花加倍的戏票钱了。

又过了一段时期，买办阶级的气焰已没有开始时那么盛了，而且上海人穿洋装的又渐渐增多起来。那妓女、洋人加倍的风气，就自动取消了。

现在人们听到上海在五十年前，戏园中有妓女、洋人票价加倍的事，都以为是笑话，往往反问道："真有这种事么？"实在千真万确。问问六七十岁的老年人，谁都可以来证明的。

小叫天的倒彩风潮

在一九一二年左右，谭鑫培（小叫天）应上海新新舞台之邀而南下，这一次卖座并不佳妙，于是新新舞台的老板黄磋玖着了急，便要求老谭唱一出《猪八戒盗魂铃》。并且说："这一出戏如果你肯唱，一定可以叫座，卖这么十几个满堂。"这分明是资本家压迫老艺人。老谭听了，本来是应当拒绝的，一来，这不是老生的戏；二来，还带些武功，近七十岁的老艺人，自然不会讨好的。但是这次南下，生意不是顶好，自己已经很失面子了。既然老板有此要求，不妨应酬他一下。因此，老谭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于是新新舞台大登其广告，把谭鑫培的《猪八戒盗魂铃》说得天花乱坠。上海人没有见过这出戏，自然肯来上当。这一天，卖座确是空前。讲到戏呢？老谭的本领，本来无所不能，当然可以玩一下，但是并不能算他的拿手好戏，总算过得去就是了。

不料这一夜，有一个观客，他见老谭年纪大了，手脚不很灵活，便高叫了一声倒彩。这真是惊人的大事，不但伶界大王谭鑫培从没吃过倒彩；今天新新舞台把他当财神菩萨请来，刚刚第一次卖满座，哪里经得起一声倒彩呢？于是新新舞台座用着的望清[1]们，一共有七八个小流氓，个个如狼

似虎，顿时赶过来，七手八脚地把这喝倒彩的观客一把拖到账房间里去，把他关起来了。于是这一出《猪八戒盗魂铃》，就在这混乱的空气中草草不恭地演完了。但是有一部分观众拥到账房间去，要求释放那方才喝倒彩的人。双方争持了一个多钟头，后来大家因时候太迟而毫无结果，便陆续散去。至于关在账房间里的那位观众，等人都散完后，戏园方面也就把他放了。

不料在第二天，报纸上一致攻击新新舞台不该侮辱观众，而那喝倒彩的人见了报，便到各家报馆去陈述当时被关禁的情形。于是从第三天起，报纸上资料更多，攻击更烈，大有不可收拾之势。这样一来，老谭在新新舞台的生意，大大地受了影响，大家见喝彩会喝出事情来，敢冒险去看戏的人就少了起来。

新新舞台老板黄磋玖见外面局势如此，而生意又好不起来，当然更为焦急了。黄磋玖向来自称"茄门头脑"，以为他的脑子是德国货，总要高人一等。因此他大动脑筋，居然想出一个釜底抽薪的妙法来。他见各报的攻击文章，骂得最凶的，是一个姓郑的作者，其他不过附和而已。于是他用擒贼先擒王的方法，在第五天约了姓郑的吃中饭。

二人本不相识，一见之下，大家先敷衍了几句。继而黄磋玖承认新新舞台办事人员举动太鲁莽，自己先认了错。其次又说我们不应该使老谭心里难受。结果，无非种种费心，看在兄弟薄面，笔下留情，不必再斤斤于此了。姓郑的见他

① 望清：戏园里招呼观众和维持秩序的人称望清。一般都由流氓充任。

这样，倒也不说什么。二人喝过酒，吃完饭，姓郑的便穿了长衫告辞。

岂料他回到家中，脱长衫的时候，忽然发现长衫袋内有一包钞票。奇哉怪也！这不用说得，当然是黄磋玖耍的把戏。不知在什么时候，把这一包钞票塞进袋里去的。后来姓郑的把这一包钞票派人送还黄磋玖。依旧在报上将他痛骂，黄磋玖倒也无可奈何。有人说姓郑的幸而不贪小利。

黄磋玖的钞票是不容易拿的。因为从前有人拿了他的钞票，上过一次当。

那也是一个所谓海上文人，他在小报上挖苦了黄磋玖，黄磋玖便邀他到"一家春"菜馆，请他吃西菜。当时老黄再三道歉，非常客气，要请他帮忙。说时，身边摸出一卷钞票来交给他。后来二人吃罢西菜，那人便先走了，不料刚走出"一家春"门口，就有两个巡捕房包探将他捉住，一搜身边，有一大卷钞票，而钞票上张张都有黄磋玖的图章。于是说他敲竹杠，便捉到巡捕房里去。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因为黄磋玖约这人吃饭前，已先报告捕房，说是有人敲他竹杠，要他多少钱，他已约好此人今天午刻在"一家春"吃中饭，当场交付款子，共计若干元，钞票若干张，每张上都盖有他的图章，望派包探在"一家春"门口守候，捉住此人，搜出真凭实据来，办一个应得之罪。这是黄磋玖设下的毒计，那人不知底细，便上了圈套。第二天解公堂，便判了个永远逐出租界。后来这个人便只能回到原籍，无法再留在上海了。

姓郑的骂过几回，因黄磋玖认了错，他在报纸上就不再

谈《猪八戒盗魂铃》的辱客事件了。其他的报纸，看见姓郑的不提此事，大家也就松了劲。再过几天，报上冷冷清清，谁都不提了。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消灭了九龙口

凡旧式舞台，都是突出的正方形的东西，而舞台和后台相隔开的地方，有一排板壁（也有用若干扇长窗的）。左右两端各有一个出入口，但没有门。在右面的，称上场门；左面的，称下场门。上场门的门框上，往往有“出将”二字；下场门的门框上，往往有“入相”二字。而这两个门框上，都挂有门帘。凡是旧式舞台，都逃不出这一个形式。

在靠近这板壁的地方，是“场面”（即指乐队）的所在地。凡敲锣打鼓、吹笛操琴的五六个人，都坐在这里。而鼓手一定在上场门的旁边，这打鼓佬的旁边，叫做九龙口（后来“场面”曾移到台中，现在则一律在下场门的一边了）。凡是正场角色出场，走到九龙口，必须要立定整一整冠，然后再出来，这是京戏班里的规矩。

据说在晚清，宫中演戏的时候，光绪帝（载湉）往往喜欢跳到台上去，赶开打鼓佬，自己来打鼓。打鼓佬是戏台上的总司令，非常重要。打鼓佬有错误，戏就会唱糟，所以正角出场，走到九龙口，更要在这皇帝旁边站定，整整自己的冠，表示一下敬意。其实是打一个招呼，请他不要把戏弄糟。这一种在九龙口整冠的动作，后来成为习惯，不但在宫内，就是在宫外也流行起来，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规矩了。

四十年前，上海第一家改筑新式舞台而采用布景的，就是夏月珊、潘月樵等在南市十六铺建造的新型剧场，名新舞台。舞台改了式样，而且采用了布景。不过夏月珊等虽改造了舞台，但仍以演老戏为主，仅仅把每天的压台戏改演新戏，尽量采用布景。而上面从开锣戏到压轴戏（即指倒数第二场戏），出出还都是老戏。在这新式舞台上演唱老戏，就发生了一个小问题，它既不适合一律用布景，又没有那"出将""入相"两个门，叫演员从什么地方登场什么地方下场呢？

于是设计了一张软片布景，中间画些图案画，左右也各开一个门框，挂上门帘。把这布景挂在台上，就可以唱老戏了。不论文戏武戏，都通行无阻。新舞台第一次画这张布景，中央的图案是"狮子滚绣球"。后来过了几个月，用旧了，又换新的，图案也改为"万象回春"。从此大约每隔几个月，必更换一次新的，图案也必更换。

这样一来，舞台上改变了样子，舞台和后台相隔开的东西，硬的变成软的，固定的变成活动的，要用的时候放下来，不用的时候吊上去，于是"场面"的地位就有了变化。他们不能搬来搬去，只好换到观众看不见的地方去了。这一个改革，不但把九龙口的地位消灭得干干净净，连在九龙口整冠的封建礼节，也因舞台革新而一起革掉了。

大凡台上要放一张布景下来，先由管布景的人拍几下手，招呼上面的人放一张什么布景下来。他们把所有的布景预先定了名称，如"大客堂""小房间""花园""书房""荒野""道路"等等，下面喊什么，上面便放什么下来。逢到剧

中不需要布景，要放那出将入相的玩意儿下来时，因为这东西没有名称，便唤它“绣球”。这“绣球”二字，本来是临时的名称，等到几个月后，“狮子滚绣球”的图案已改“万象回春”的图案，他们竟仍呼“绣球”，不呼“万象”。因为已经喊顺口了。此后台上虽然每隔几个月必定更换一次图案画，而新舞台布景工人，总是称它为“绣球”，不再换新的名称了。

自从新舞台的布景一鸣惊人后，上海各家戏园都来效尤，邀新舞台的布景工人出来主持其事，什么都依样画葫芦，连“绣球”二字也输入到各戏园的后台了。其实，他们画的并不是“狮子滚绣球”，省得动脑筋，都叫它“绣球”了。于是这“绣球”二字，便成为京剧界中的行话。

后来汉口、天津等地风气一变，也改造舞台，采用布景。上海各戏园的布景工人，便如天之骄子，到各码头去大出风头了。

北方京剧界中人，见了上海布景工人画的一张所谓“绣球”，问他们“这叫什么？”一个操着上海浦东话的工人回答：“绣球”。他们听了，当然不会明白“绣球”二字的原意，竟误听为“守旧”二字。他们想了一想，作会心的微笑，点点头道：“对！很有意思！他们的那些‘花园’、‘客厅’等等布景，都是新的玩意儿，我们这个墨守旧法的上下场门，称为‘守旧’，倒也合适。”这样一来，全中国的京剧界中人，都称这东西叫“守旧”了。全国统一，别无第二个名称，连各地的票友也晓得这叫“守旧”。而且近来“守旧”二字，已由北方传到上海，来一下“逆输入”，于是上海的京剧界中人，竟也称它为“守旧”，不再有人称它“绣球”了。最近在几本出版物上，

也见到"守旧"这个名称，可见"守旧"二字以后也决不会变更了。我想将来再过五十年或一百年，有人要研究这东西为什么叫"守旧"，恐怕无论怎样博学的考古家，也不容易考据出这是从"绣球"二字，糊里糊涂演变成的。当然更不会知道这一个东西的产生，还消灭了一个九龙口行敬礼的封建礼节。关于"守旧"的名称，某老艺人曾有一首打油诗道：

守旧原来是绣球！　京腔沪语各千秋。
舞台掌故君须记，　回首当年风马牛。

大快人心孙悟空

三四十年前，九亩地的新舞台编了一出《济公活佛》，号召力很大，一连编到三十几本。有人对编者说："你什么戏不好编，为什么一定要编这迷信成分浓厚的济公活佛呢？"编者听了，对他笑笑，答道："你错了！你以为济公活佛是迷信么？你真跟读了《红楼梦》当它是淫书的人一般见解了。"他又说："我们编戏，第一，要使观众满足，才能吸引观众。要满足观众，最好是大快人心的资料，这是舞台上的不二法门。济公活佛所表现的，无非使受冤屈的人抬头，使强行霸道的人屈服，替人民打抱不平，把一桩桩曲折的案子，他来弄得清清楚楚，这就能大快人心。在从前，我们舞台上只有一位包龙图，可以把什么案子都审得明明白白，也能大快人心。不过这位包龙图能力有限，现在似乎不够要求了，所以我用一位济公来代替包公，目的还是在大快人心，并不提倡什么迷信。"

那编者还对人说："租界上洋人如此猖獗，一味欺侮华人，我总想编一出大快人心的戏来，给上海人出出气。但是这位主角，恐怕济公还不够，一定要再去找一位神通广大的人物来。

所以他后来编了一部《新西游记》。说的是，孙行者、猪

八戒两位胡闹朋友来到了上海租界，孙行者因为在路上小便，被捉到巡捕房里去。

巡捕房的外国捕头问孙行者道："你为什么在马路上小便？"孙行者伪装胡涂，反问道："这里是什么所在？"捕头说："这里是巡捕房。"孙行者笑道："是房么？你把我拖到房里来，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我是出家人，阿弥陀佛！我不喜欢进你的房，另请高明吧！"

那捕头听了，勃然大怒，叫人把孙行者关到那铁房子里去。孙行者一踏进这铁房子，见里面已关着七八个人，都是愁眉不展的可怜虫，他就说："善哉善哉！老孙来救你们出去吧！"他说罢，拔了一把毫毛，吹上一口气，顿时变成了七八个外国捕头。那面孔与服装等等，完全与柜上的那个捕头一式一样。这几个假捕头，高声唱起外国歌来了。外面听得里面吵闹，便打开铁房子的门来看看。不料这门一开，那七八个假捕头各人扶了一个犯人，大踏步走出巡捕房，扬长而去，弄得看门的巡捕也莫名其妙。

但孙行者还关在里头，不动声色。歇了一会，那七八个假捕头都回来了。回来之后，都到柜上去办公，要赶掉那真的捕头，弄得那真的捕头手足无措。其时孙行者自己在铁栅门内钻将出来，哈哈大笑。他用手一指，忽然那七八个假捕头一齐变成了七八只猴子，孙行者叫着道："羊肉当狗肉卖，外国人当猢狲卖。外国人都是我齐天大圣的子孙。"

孙行者把身体一摇，毫毛都收到身上，猴子一齐不见了。那真的捕头晓得这孙行者是个怪东西，便下令两个外

国巡捕，要用手铐把孙行者拷起来。孙行者马上再拔一把毫毛，对空中一掷，忽然变成无数的外国巡捕，一个个都拿了手铐，要把这捕头拷起来。捕头一着急，身边就摸出手枪来，要向一群外国巡捕开枪，此时外国巡捕也个个从身边拔出手枪来，同捕头对抗。捕头见势头不对，晓得孙行者不是好惹的，便立刻回过头来，笑嘻嘻地同他拉拉手，再拿出一瓶外国酒来，倒在杯子里，同孙行者对喝。孙行者就把他的酒拿给外国巡捕们喝，外国巡捕非常开心，把捕头的几瓶酒一齐喝光。孙行者忽然对捕头道："你不能喝了，我们喝的都是外国酒，你喝的是猴子的尿，你若不信，可以闻闻味道。"孙行者用手向酒杯一指，那捕头向杯中嗅嗅，当真有一股臭气，便一个恶心，吐起来了。

台上尽是这些噱头，看得台下的人哈哈大笑，巡捕房的外国人，总是弄得走投无路。诸如此类大快人心的动作，层出不穷，所以《新西游记》的头本，就轰动了全上海，于是再排二本。二本更淋漓尽致，把外国人挖苦得无微不至。看戏的人见外国人出丑，无不满意。因一向受饱了外国人的气，现在买了戏票，痛痛快快地看外国人出洋相，借此也可以出一口怨气。

租界当局得了这消息，便派人去看戏。看戏的人回报当局，弄得外国人啼笑皆非。而新舞台又不在租界上，租界当局竟毫无办法。后来晓得新舞台的前台经理是姚紫若，而姚紫若的子侄辈有好几个人都在工部局服务。于是外国人大动脑筋，对这些在工部局的姚姓人员大施压力，要打破

他们的饭碗，使他们大感不安。因此，新舞台的老板便动摇了，对这出《新西游记》，就来一个适可而止，第三本不编下去了，而头本二本还是照旧常常演出。

什么叫做“文明戏”？

在十九世纪末叶，上海戏剧界只有一个剧种。当时昆剧、徽剧俱已衰落，皮簧戏一跃而起。他们融合了昆剧、秦腔、高弋和汉调等各种剧艺的特长，而创造了以徽戏为经的皮簧戏，再加清廷中非常爱好此戏，于是被推为国剧，盛行于北京，而后普及全国。因之，便称为京剧。这是从同治年间开始的，所以上海在当时，昆剧、徽剧渐见不振，只有京剧抬头了。

上海在中国的海岸线上。上海人士接触欧美的空气极早。因此，一班爱好戏剧的人知道世界各国都有话剧，而且他们也曾在上海见到外国的话剧。似乎感到中国也有产生话剧之必要。这些爱好戏剧的人虽然有了这样的想望，但还无法变为现实。

这时候，戏剧界中人也受了环境的影响，打算把京戏有所改进。于是创造了一种时事新戏，亦称时装新戏。这是以现代情节、现代人物为资料，服装全用现代打扮，说白不用中州韵，改用京语或方言，剧情都有头有尾，不象京剧那么只有片段。这样的时事新戏，卖座居然不错，观众相当欢迎，不过他们仍旧唱皮簧，一定要用几句摇板，拿来点缀。他们在说白上，似乎已接近话剧，但他们不肯放弃皮簧，所以

后来他们的进展，只不过在改造舞台采用布景上用功夫，并没有朝话剧的方向发展。

话剧确是创始于上海。参加演出话剧的人，太半是些学生。上海的学生们，每年看了天主教徐汇公学学生在恳亲会上公演的外国语话剧，便大受刺激。从此，上海的学校中，便常常借着开会的名义，有演剧之举，演的当然是话剧。这话剧，虽然全用中国话，不唱摇板，但是还很幼稚，不过他们已经向话剧的方向迈进了。

其时中国的留日学生，也有许多人研究起话剧来。那时日本的话剧，也处在萌芽时代。日本本来只有一个剧种，叫做"歌舞伎剧"，这还是德川时代传下来的旧东西，说白另有一种腔调，不是普通言语，而动作，含有舞蹈气味。直到甲午之役，日本为了鼓吹战争空气，便有一班好战分子创造了一种纯用普通言语的戏（即话剧），因为演者都是日本人所谓的"壮士"，所以最初称为"壮士剧"。战争终了后，这鼓吹战争的话剧，改为专以著名小说为题材。但此时不称"壮士剧"了，叫做"新派剧"。于是那"歌舞伎剧"就被称为旧剧了。

中国留日学生和上海的学生，大家研究话剧，便创造了话剧，双方沟通意见，于是定名为"新剧"。这新剧二字，是从日本的"新派剧"和上海的"时事新戏"两个名词变化而来。

新剧正式成立，而在上海长期演出，这是一九一三年的事。后来大约过了十年光景，才有话剧这个名称。这是在南国剧社时代，由南国方面的人定出这两个字来的。大家

对于话剧两字都很满意，于是就不用新剧这名称了。因为"新"字，有时间性，不能过了十年还是只管"新"下去的。

在新剧倡始时期，社会上有一部分人，把新剧称之为"文明戏"。他们以为，没有吹打的结婚，称文明结婚，那末，这没有吹打的戏剧，当然应该称文明戏。因为在辛亥革命当时，凡社会上一切新事物，往往都冠以"文明"或"改良"二字，如手杖，称为文明棍。妇女梳的朝前髻，称为文明头。还有一种专门送礼用的镜架，装些花花绿绿亮晶晶的东西在内，叫做文明镜。那时文明二字非常流行，都出自于一般人之口。而一般剧人对这不伦不类的名称，既不接受，也不反对，觉得他们很天真，付之一笑而已。不过总以为这样的称呼实在不妥当，难道有吹打的戏剧，都是野蛮戏么？

文明戏这一口头名词，真如昙花一现，只有一年半工夫就湮灭了。不料过了三十年，又有人用"文明戏"这名词了。凡是对于不满意的戏，或者低级的戏，往往说："这简直是文明戏！"或者说："这有些象文明戏。"这是现在的人不晓得"文明戏"三字的来源。当初仅仅是一句空话，此刻把它借过来使用，却别具新义了。不过借用得不大妥当，好象过去真有那样剧种似的，所以弄得有些令人莫名其妙了。

上海第一家游戏场——楼外楼

上海第一家游戏场创始于清朝末年，地点在南京路以南。这里是浙江路、九江路、湖北路三条马路之间的一个三角地带，原有一所戏园，名叫新新舞台，大门在九江路上，而屋顶平台另外造了一个屋顶花园，由后门出入，这后门正对南京路，这就是上海第一家游戏场——楼外楼。但当初不称游戏场，叫做屋顶花园。

楼外楼是一个姓经的人创办的。它上面的布置，就是后来上海许多游戏场的雏形。因为面积很小，除露天处可以眺望一下全上海的风景外，屋内的场子只有一所，可以卖卖茶，台上有些说书、唱滩簧、演戏法等简单的节目，台并不大，不能演戏。当初就是屋顶花园四个字，已经可以号召游客。因为屋顶可以布置花园，在当时的上海人听来，已经是奇闻了。登临一望，也可以饱饱眼福，尤其在重阳日，大家要登高，就不必远赴龙华去登龙华塔顶，只消玩一玩楼外楼也可以实现登高的雅兴了。

楼外楼台上的几档节目，都很平淡，不能号召游客。而其号召力除了可以登高远眺外，还有两件东西很起作用。第一，是电梯。当时上海还没有电梯，买一张票子上楼外楼去，就可以在电梯上升降。对当时的上海人说来，这也是一

种乐趣，所以竟有住在近郊的人特地到上海来，买了票子乘一下电梯，觉得这比玩城隍庙更有趣。第二，是一种凹凸镜，与着衣镜一样大小，大约有十几块，每块作用不同，一个人对镜一照，有的会变成矮而胖，有的会变成瘦而长，面目依然，而形态大变，看得自己也觉啼笑皆非。这镜子，取名哈哈镜，也大有号召力。后来有人造谣言，说楼外楼有一面镜子可以看得见前世的父母。于是一班迷信的人都要去看看自己前世的父母，不料没有看到前世的父母，却看见了今世的自己，已变成奇形怪状，于是大呼倒霉而去。

楼外楼小小的地方，实在不能满足游客们的兴趣。那末，那戏台上的节目，有些什么可以吸引观众的呢？实在没有。王君达与王美玉一对夫妇，当时的确在楼外楼登台演唱的，王君达乃林步青的干儿子，所以名林继青，王美玉当时还从母家的姓，名周美玉。二人在那时演技一般，尚未成名，引不起注意。二人以外，更无足取。王君达与王美玉之成名，还在十年之后呢！

楼外楼的主人经某，是个大资本家，他手腕很灵活，也颇有魄力。他在楼外楼不过小试其技，他后来还办过新世界游戏场，办过洗清池浴室，办过万国公墓。他做过某洋商地产公司的买办，本是地皮掮客出身。我要谈游戏场，不能不把这位人物特别介绍一下。现在先从地产公司和那些地皮掮客的罪恶勾当谈起。

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都说："全地球的地皮，无论哪一处，地价总是一天天地涨，决不会跌落的。"所以在新开埠的上海，就有外国人开了好几家地产公司，购进大批廉价的地

产，等涨到了相当的价钱，然后卖出。于是再向荒凉而有发展希望的地方去购进廉价土地，以待善价而沽。这是地产公司的营业方针。

但是地产公司要收买许多地皮，也并不是容易的事，人家非万不得已，决不肯轻易卖出地皮。如果要积极购求，不是价钱就会高起来么？但地产公司的周围有一班地皮掮客，掮客手中自有许多可卖的地皮。掮客，本来是介绍人，亦称经纪人，各业都有，将卖方之货介绍于买方，以成交易，这就是掮客。而地皮的掮客，更与别业的掮客不同，如果自己手里没有货色，他们会偷会抢，可以把人家的地皮偷来抢来，拿去卖给地产公司。地皮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拿起来，又不是可以藏在身边的货色，怎么能够偷或抢呢？须知那些掮客必定与一班地保们连络，地皮的买卖，非经地保的手不可。掮客与地保狼狈为奸，那末，或偷或抢，都可以随心所欲了。

坏心肠的地保，见有的农家男人死了，家中只剩些孤儿寡妇，他晓得这一户人家大可以欺侮一下。他便和地皮掮客勾结起来，先去代那一户人家报告方单（即执业证）遗失，这一件事情，本来只要有地保作证，报告了方单业已遗失，便可花一笔钱申请补一张方单，叫做"升库"。升库的钱，可以由掮客垫出，这数目虽然也不小，但总比地价便宜得多。这手续一办妥，那新方单就出来了。既有地保作证，当然事情不会虚假，所以升库的要求不会不准。他们拿了这新方单，便将之卖与地产公司，卖地皮的出面人，可以写那已死的原主人的姓名。这样，这块地皮便归地产公司所有。于

是掮客与地保把这笔钱二人分肥，就此完结。这样的事，可以说做得人不知鬼不觉，二人把人家好好一块地皮，戏法一变，变到地产公司去了。

过了若干时候，那户人家见地保不把粮串送来，不叫他们去完粮，不要他们出钱，便也不放在心上。又过了若干时候，见邻近人家，家家都完了粮，于是那一户人家就疑心起来，不免要去问问地保，说道："为什么不来叫我们去完粮？"其时，那地保方始说道："你们的地皮么？那是早已卖掉了，你们自己怎么不晓得？"妇人听了此话，当然惊异，再三盘问地保时，地保说："这地皮已经被外国人买去了。"他们合家人听了，自然奇怪，而且不信。地保就说："这是你丈夫做的事，你怎么不知道？"那些妇女们因为完全不知道，便要求地保向买进的外国人说话，一时弄得合家哭哭啼啼，有的甚至投河上吊，连性命都不要了。地保等她们冷静一些之后，便说："这是外国人的一家地产公司买进的，你去向谁说话呢？还是过一天我来把你们的事，向那公司的中国人买办，去问一声吧！"于是约定了日子，地保带了孤儿寡妇到约定的地点，在某处茶馆中与买办会面。其实，会面的并非真买办，就是那混账的地皮掮客。地保其时做好做歹，代那妇人说了一大套，于是那冒充买办的掮客说："这件事情是由你丈夫干的，有他亲笔签名为证。"那妇人便从身边取出方单来给那掮客看，那掮客说："这是旧方单，已经作废了，毫无用处。我们买的是新方单。"那妇人听了，自然毫无办法。于是地保再假意殷勤，说些好话，要求公司方面贴补她若干钱，救济救济他们。其时掮客便顺水推舟，说道："公司中账

已经付清，当然不能节外生枝。这么办吧，我看你可怜，由我来贴补你五十块钱吧！公司中是不肯出的。"地保更在旁劝劝那妇人，那妇人只好收篷。如果不拿这五十元，那末，连一个钱也拿不到了。于是叫她出了收条，把钱拿去，此事就算完结。

这就是掮客与地保勾结偷地皮的玩意儿。上海滩上，这样的罪恶史不知有多多少少。洋人的地产公司全靠了这些地皮掮客，而地皮掮客全靠这样的变戏法，偷人家的地皮，自己去发财。

那经某，本来也是地皮掮客出身，后来因为他手腕灵活，已经做了地产公司的买办了。他那家外国人的地产公司，叫做"中国营业公司"，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名称。从这六个字上，既看不出是外国人的公司，又看不出是收买地皮的机关，看来多么堂皇啊！

经某就在买卖地皮上，跟新新舞台发生了关系。他也投资若干，而且由他设计，在戏园上面造一屋顶花园，由他承租这屋顶花园，去经营娱乐事业，开办了楼外楼。

其时经某一面在中国营业公司做买办，一面办这屋顶花园楼外楼。他每天下午一定到楼外楼去办公，于是有什么关于地产公司的事，而不便在公司中接洽的，人家便到楼外楼去找经某。所以当大家欢欢喜喜地在这屋顶花园玩耍时，也常会有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小孩子，由地保领着，来见经某，哭哭啼啼，诉说家中苦况，旁边再由地保装腔作势地说好话，而经某当然代表公司方面，一味打官话，说道："交易已经做成了几年，怎么还可以来敲竹杠？"结果做好做歹，

给他们几十元了事。经某已是买办阶级，不比得指客，所以不在茶馆中谈判，一定要有一个适当场所谈话。这楼外楼便是经某非常适当的第二办公处。

新世界的产生

经某办了若干时候楼外楼，觉得此业大可发展。不过楼外楼条件不够：第一，地方太小，仅靠登高远眺，已经引不起上海人的兴味，而且电梯和哈哈镜，不过能轰动一时，没有持久性，初见似乎有趣，多玩也没有什么道理；第二，经某自己也觉得在这屋顶上不够他发挥。因此，他另行动脑筋，在南京路与西藏路的西南角上觅到一块地皮，不但面积比楼外楼宽大得多，而且平地上当然比屋顶上便利。经某就把这块地皮弄下来建造了一所更完善的游戏场，取名新世界。内部一切，当然比楼外楼高明得多。可以说这新世界，便是后来上海产生的许多游戏场的先锋。

楼外楼是因陋就简，新世界就大大发挥。内部场子很多，每一只台上，午后至深夜，轮流表演各种游艺，搜罗了各种戏剧和曲艺，非常完备，不但南方的应有尽有，连北方的玩意儿也尽力罗致。此外，杂耍也不少。真是稀奇古怪，无所不有。

电影场也很能号召观众，因为当时正流行一种连续性的惊奇片，很有吸引力，能令人看了再要看。

还有跑冰场与跑驴场，更能吸引某些青年男女，所以当时的新世界，营业状况很好，何况只此一家，别无竞争者，当

然成了独行生意。至于楼外楼已无人注意了。实在新世界的主顾，是多方面的，一个人往往可以从下午二时，买了一张票子进去，直玩到深夜回家。这十几个钟头中，有吃有看，竟令那些纨袴子弟流连忘返。

各种点心，热的冷的，甜的咸的，无一不有。就是要吃夜饭，也很方便。此外小吃的东西，也五花八门。那在新世界内，做托盘生意、卖糖果零食小吃的，有二三十人之多，生意都相当地好。据说，每一个做托盘生意的人，他家里都有一个小小的作场，他们合家的人，一天到晚在家里赶制这些小吃，大家做得很忙，供他一个人售卖，还有些来不及。因为他们卖的东西，如果去批发来，实在有些不上算，必须自己赶制，利润才优厚。只此一点，托盘的盛况可知，新世界的盛况可知。

本来上海每逢夏季，还有一些夜花园，这都是临时性的，设备并不高明，而盛况倒还可以，不过自从新世界开门以来，夏天的夜花园就此关门大吉。因为新世界可以代替这些临时性的夜花园了。

在新世界蒸蒸日上之时，这位手腕灵活的经某，因病去世了。新世界和其他一切经某所办的事业，当然受到相当损失。不过还好，他的太太非常能干，她是个女中丈夫，叫汪国贞。她竟能自己出来办理丈夫的一切事业，除中国营业公司买办一职推荐她的外甥张石川去担任外，其余都是汪国贞自己来干。

大世界后来居上

当新世界成了上海唯一的娱乐大本营后，就触动了上海一个鼎鼎大名的投机大王，对此大感兴趣。这投机大王是谁呢？就是黄磋玖。当时他是中法大药房的主人。此人一向会动脑筋，手腕非常灵活。他见这游戏场事业大有前途，便打算自己也来干一下。他很自信，如果办起来，一定可以胜过经某。

他看中了地价比较低的法租界，在洋泾浜旁边西新桥街上觅得了一方地，面积比新世界大得多。因此先定下了名称，叫做大世界。

黄磋玖看出了新世界的弱点，就是面积不大，房屋很挤，缺少露天娱乐场所。他便竭力避免这些缺点，房屋尽管造到三层，还是尽量留出露天的娱乐空间，因此在开幕之时，还有什么空中飞船，可以使游客乘坐了在空中环游一周，以引起上海人的好奇心。

大世界内的场子很不少，戏剧曲艺以及杂耍等等，花头非常之多。其实玩来玩去总是那几样，没有什么新花样，与新世界也不相上下。黄磋玖手腕高明，他对于艺人们的包银，定得非常低，而一班艺人也只好替他服务。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黄磋玖曾经告诉他们说："你们游艺家，不能不

常登广告，否则生意就会清淡。你到大世界来献艺，每天玩一小时，便是天然的广告，并不要收你们广告费，我可以每天把戏台借给你们，使你们自己把玩意儿介绍给观众。我们大世界，还可以义务代你们接洽堂会生意，也不要你们扣头，观众看了你的玩意好，就可以向大世界账房代定堂会，如果在九月十月之间，你每天接得到两个堂会，收入就大为可观了。即使在夏荒六月，你每天有一个堂会，收入也就很不错。为了这个缘故，你们应当自动把包银尽量地减少；其次只要你们每天在台上弄得很热闹，就是天天玩重复的玩意儿，我也不在乎。"

黄磋玖对艺人们口头上说得这样天花乱坠，其实是要尽量剥削他们，而艺人们迫不得已，也只好把包银减到不能再减的程度。

法租界对于所谓风纪问题，比当时公共租界更来得放纵，大家利用这一点，大世界便变成了怨女旷夫物色对象的好地方，几几乎成了恋爱的交易所。新世界虽然也有这种现象，可没有大世界那么随便。怨女旷夫利用大世界，而大世界也利用这班怨女旷夫。如此一来，黄磋玖就发财了。生意比新世界要好上三四倍。

大世界在共和厅南面有一处不公开的地方，叫做寿石山房，这是黄磋玖的机关。黄磋玖每天在这里吃午饭。吃午饭时，一班黄磋玖的策士都不邀而自来，大家趁这吃饭的时间商量大事。有什么生意可做？有什么挖空心思的骗人之道？策士们都在此时向黄磋玖提出建议。一切大事，都定夺在这寿石山房中，所以有人说，寿石山房是黄磋玖的内

阁。那末这内阁中，是些什么人物呢？大约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投机资本家。黄磋玖每举办什么事业时，他们可以首先投资。第二类是跑腿的人，也就是靠黄磋玖吃饭的。当时黄磋玖的中法大药房有什么新出品，或者黄磋玖办的小团牌香烟公司有什么新花头，都是这一班策士们挖空心思设计出来的。

新世界急起直追

大世界开幕以后，盛况空前，新世界游客渐见减少，大有一落千丈之势，汪国贞受此压迫，大为恐慌起来。第一个问题，就是自己面积太小，不够发展，不能与大世界竞争。现在要打算胜过大世界，或者与大世界媲美，至少要把地位扩大。这里，东北两面沿马路，西南两面是跑马厅，哪里还有扩充的余地？搬地方，更不是容易的事。于是想到隔马路有一块相当大的地皮，就在南京路与西藏路的西北隅，只有这地方是个邻近的所在，因此先去挖地皮。泥城桥一带的地皮虽然名贵，但只要出得起价钱，也无有挖不到的。地皮弄到了手，内部的布置，姑且慢慢设计，最要紧是两块地皮如何联络在一起？这是一个问题。

起初，打算把新世界分为南北两部，旧有的所在称为南部，新增的部分称为北部。南北两部，不妨架一顶桥连起来，但这一计划没有获得工部局的许可。因为南京西路上面架一顶桥，许多游人来来往往，足以使下面的行人注目上面，交通上容易肇祸。如果南北两部走不通而分别卖票，游客又嫌麻烦。于是有人想出一个在地下开一条地道的法子来。这办法，虽然工部局不反对，不过把这张照会（即许可证）要到手却很费了一笔钱。

这地道的工程相当浩大，上面是交通要道，有电车汽车往来，所以这地下工程必须相当坚固。这样艰难的大工程，居然费了若干时日建筑成功了。汪国贞以为，将来北部开放，这一条地道就可以大卖噱头，比楼外楼的电梯更能吸引人，所以对于北部的布置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新玩意，不过增多几个场子罢了。

到新世界北部落成，举行南北部开放典礼之日，当然万人空巷，大家都要去看一看这上海少有的地道。他们原是抱着好奇心而去，不料由南而北，由北而南，在地道中穿了一遍，都很失望。他们说道："这样的地道，有什么稀奇？十几年前，我们在苏州火车站早已见过了，完全是一样的东西，有什么好看？"

于是新世界北部开放，而唯一的大噱头地道，竟使人不感兴趣。而北部方面，又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于是这北部可称"有若无"。但是经济上的损失相当大，挖地道既花了一笔大本钱，现在地道竟不能号召游客，而且收入不能增加，游客逛南北两部，仍旧只买一张票，所以这北部完全白送。倘使南北部分别卖票，那游人就会嫌麻烦，单单买一张票在南部玩玩就够了。

新世界北部开放而毫无噱头，气得汪国贞手脚冰冷，黄磋玖却在大世界哈哈大笑，晓得这寡妇失败了。昔日经某专会用手段对付寡妇，现在他自己的寡妇也吃了别人的亏，黄磋玖当然得意之至了。

当时有人批评说，可惜汪国贞一味要与黄磋玖竞争，所以失败得无可挽救。倘使她有魄力的话，索性与黄磋玖合

作造一条更长的地道，可以从新世界通到大世界，由地下贯穿西藏路，那一定可以引起游人兴趣。如果有钱的话，索性办一个地下小铁道，联络新世界与大世界。或者，小而言之，在地道两旁的壁上，办一个水族馆（水族馆的设备，是在壁上嵌了厚玻璃，观客在黑暗中，参观那玻璃内有荧光的鱼类），另行卖票，倒也是一个办法。无奈资本主义的经营总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互相竞争不已，哪里肯合作团结？所以汪国贞失败得一蹶不振，毫无办法，只好看黄磷玖神气。

花花"世界"风起云涌

汪国贞扩大新世界这件事，虽然弄得很不如意，但是这大世界的勃兴，新世界的扩充，倒引起了上海一班投机分子的兴趣。上海人向有一窝蜂式的怪脾气，无论哪一桩事，在没有人尝试以前，谁都不敢去尝试。等到既经有人尝试而又相当成功，他们便认为此事大有前途，很可以干得。于是你也来，我也来，大家非干它一下不可了。游戏场也是如此，他们的心理，倒并不想模仿人家，总以为我办起来，一定要比人家办得好，我的条件一定胜过他人。于是便成了一种风气。

游戏场的盛行，真似雨后春笋，东也一个，西也一个，什么花花世界，大千世界，神仙世界，小世界，闹得乌烟瘴气。踏进去一看，都是大家抄袭，一点没有什么新花头，人云亦云，看不到什么特点。所以家家都是在开幕之时，人山人海，大家无非进去见识见识，去过一趟，觉得不过如此，于是过后谁都不高兴去第二趟了。

其中值得一提的当推小世界。它虽称小世界，其实面积并不小，这是他们的谦虚。其地点也很好，就在豫园旁边，不但可以号召一班南市的游客，而且玩城隍庙的人很可以顺便再玩一玩小世界，所以在这许多后起的游戏场中，只

有小世界还能持久。其余大都昙花一现罢了。老实讲，上海的人口虽多，要常常抽出工夫去玩游戏场的，到底并不怎么多。天天在各家游戏场拥来拥去的，其实只有那些人——他们另有目的，必须要去，而且必须要到热闹的游戏场中去，所以看来看去，都是些面熟的男女。在不热闹的游戏场中，非但游客太少，而且看来看去都是些陌生面孔。所以一般怨女旷夫，不肯去照顾那些新兴的游戏场，于是这些游戏场就很难支持，弄得冷冰冰了。何况那些百货公司屋顶上也都开办了游戏场，又把游客吸引了一大部分过去。因此，这些新兴的游戏场，由于以上缘故，弄得大都无疾而终。

黄磋玖的破产

黄磋玖坐守老营大世界，为什么独能支持得很久？因为他事业做得多，不仅靠一个大世界，有时还要借着大世界做别的事业。黄磋玖一生做过不少事业，不过他到底是一个穷光蛋出身，没有大资本，全靠移东补西，拿来敷衍下去的。最初，他本来是一个眼科医生，后来开了中法大药房，这中法大药房，是他第一个大本营。中法大药房第一种出品叫艾罗补脑汁，这本是黄磋玖自己发明的，但他却说是一个叫艾罗的外国医师发明的。所谓艾罗，并无其人，只因为当时中国受帝国主义的欺侮，有些中国人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只相信洋人，以为洋人放的屁也香，所以用黄氏补脑汁，就不能号召，用上艾罗二字，而且说明他是一位外国的大医师，这艾罗补脑汁就销路非常好。这一下，给黄磋玖发了一笔大财，巩固了中法大药房的基础。从此他以中法大药房为大本营，向外发展办新新舞台，办大世界，办中西大药房。他的大本营，仍在中法大药房。直到大世界一成功，那黄磋玖的大本营便搬到大世界去，而不再终日在中法大药房了。后来办香烟公司，就以大世界为大本营了。

黄磋玖一向很穷，跟银行没有往来，而事业做得很多，所以常常周转不灵。有一次，他需要一笔款子，隔天非付出

不可，而要四五天后才有钱进门。他便向朋友借了一辆汽车，坐了汽车去买钻戒。那店中见他坐了汽车来，以为他一定是一个阔客，因为当时中国人坐汽车的还很少。他把钻戒横看竖看，拣定了四只。他对店中人说："我要拿回去商量商量，四五天后再给你们回音。"他再留下一张名片，又说："如果你们不信，可以派一位伙友与我一同坐车子去，看看我家里的地点。"那店中人听了，见他来头很大，坐着汽车来买钻戒，哪有欺骗之理？便笑着说："不必，请你四五天之后，给我们回音好了。"如此，黄磋玖拿了四只钻戒，当夜就把它押掉。次日，把一笔不能不付的款子一齐付清，这是应急的。四五天之后，款子来了，他先去赎回了四只钻戒，才打电话给那一家卖钻戒的店铺，叫他们派一个人来，说道："我家里人只看中了一只，现在还你三只，买你一只。"他就付了一只钻戒的钱。过了一天，他把这一只钻戒又卖给别人，变了现钱。他老是这样移花接木地张罗款子。

在艾罗补脑汁生意很发达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外国人，带着翻译，来见黄磋玖。他说是艾罗医师的儿子，父亲叫他来算账。黄磋玖听了，心里明白，并不惊吓，知道这一定是有谁晓得艾罗并无其人，所以不知从哪里弄了一个外国人出来，冒充艾罗之子，目的无非想敲竹杠。黄磋玖不慌不忙，当场敷衍了过去，暗中约那翻译隔天来谈话。第二天，老黄见了翻译，说话一句硬，一句软，意思无非说他没有领事馆的证明，怎么晓得他是艾罗之子？而且艾罗医师早已去世，他只有一个女儿继续他的卖药事业，我们一向找他女儿，账目每月结清，他怎么会不知道？现在他既经来了，

我也不好叫他白走一趟。我打算送他一百元盘费，他如果答应的话，不妨明天你与他一同来取。第二天，那冒牌外国人当真来了，老黄果然付他一百元，叫他当场出立一张收条，就此了结此事。

在交易所很盛行的时候，黄磋玖便在大世界办一个夜市交易所。人家交易所只有日市，他独利用夜间，使投机朋友有所消遣。而且还办一个日夜银行。黄磋玖办这两个事业，目光很远大。他生平吃了贫穷的亏，只有空场面，所以天天挖肉补疮，他现在办交易所，打算大大地捞一票。办了银行，从此在金融上不必向人家借贷，可以在自己银行里调头寸了。因为他没有实力，信用一向并不很好，这是他的弱点，所以他非有一家银行不可。

不料交易所一开门，黄磋玖的如意算盘很难如意。交易所中来了一班赌客，手段比黄磋玖高出数倍，他们都是投机专家，黄磋玖哪里比得上，个人竟大蚀其本。他晓得长此以往，恐将站不住脚；万一交易所本身发生了问题，一定会体无完肤，所以他知难而退，设法交卸了交易所的责任，自己专管日夜银行。表面上说得很体面，骨子里他是要保住自己的实力。

在交易所关门后，黄磋玖的日夜银行再维持了若干时候，后来他忽然也要想玩房产了。在浙江路偷鸡桥附近弄到一块地皮，可造市房二十余幢，这在热闹之区是千稳万妥的产业，所以费了几个月把这新屋造成，指望在这偷鸡桥附近换一个新面貌。岂料事情并不如此简单，这时刚在"一二八"战争之后，上海市面一落千丈，连最热闹的四马路一带

尚且有空关房屋，贴满了召租，这是四马路从来未有的奇事，市况萧条，可见一斑。所以这偷鸡桥一带的新屋，在房屋将要完工时，尚无人来租借。这可把黄磋玖急坏了。万一落成之后，这一带二十几个门面，完全上了排门，门上都贴了召租，会给上海人很不好的印象，哪里还有人肯在这萧条的地方来开什么店呢？他死要面子活受罪，便自己掏出腰包来，先开五六家店铺，一家是药房，一家是茶食店，一家是笺扇店，还有一两家不知是什么店。总之，都是黄老板自己开的，拿来遮遮世人眼。但是他虽辛辛苦苦撑这空场面，而其余的房屋还是空着，一个人也不上门来租借。

正在这个时候，日夜银行忽然倒闭了。原因是银行里的钱早被老黄用光，他周转不灵，房屋上又一无进展，外面风声又不好，于是大家都来提款，竟把日夜银行逼倒了。而且来日夜银行存款的，大半是大世界中游艺界人物，外人有谁信任这家银行？吃大世界饭的人，有了钱，不能不尽义务似地存入日夜银行。此刻一倒，连这一班吃开口饭的人也个个怨声载道。黄磋玖在此时，内忧外患相逼而来，他怎么还活得下去？年纪老了，心境既恶劣，一场大病，就此一命呜呼。

自从日夜银行一倒闭，流氓黄金荣有一笔存款在内，去向黄磋玖交涉。还有与黄金荣有关系的一部分人，也有存款在日夜银行，也附带托黄金荣进行交涉。黄金荣做了一大部分债户的代表，与黄磋玖谈判。结果，黄磋玖便把大世界作价，偿还这一些债户。黄金荣是其中的大户，所以大世

界归黄金荣拿了去，其他小户的款子，由黄金荣还给他们。为了这一个关系，大世界的主人虽然仍旧姓黄，但已不是黄碰玖，而是黄金荣了。

最初的电影院和电影公司

上海第一家电影院，地址在跑马厅对面，即泥城桥新世界之西，黄河路口，龙飞马车行之东。那是在一片空地上搭着一幢木造房屋，叫做幻仙影戏院。

上海第一家电影公司，成立于辛亥那一年。这是张石川、郑正秋二人和一个外国人合办的，叫亚细亚影片公司。演员都从苏州去邀来，是一班话剧胚胎时期的人物。大约拍过两三部片子，片名记不得了，一部以描写城隍庙为主。还有一部，好象是一个人夜间假扮无常鬼，出来吓人，夺取行人财物。总而言之，那时的编剧，既无主题，而演出又毫无意思，摄影技术又不高明。还有一个大缺点，是没有女演员。男演员都不容易找到，何况要觅女演员？因此，因陋就简，便用男演员来代替女演员，男扮女装，弄得不伦不类，更使观众扫兴。

张、郑二人，对电影本来是外行，总以为外国人会有些经验，找了个外国人来。不料这外国人也是初次尝试，所以张、郑二人得不到他什么益处，从而把这桩事业弄得一无成绩。于是，不到一年，这亚细亚公司就解散了。

在亚细亚影片公司关门之后，上海出现大批电影公司之前，其间却产生了两家客串式的电影公司。这两家都不

是独立的，一家属于商务印书馆，一家属于英美烟公司。属商务的，厂设宝山路，出过几部片子，有《崂山道士》及梅兰芳的《春香闹学》，据说还有《黑籍冤魂》及《大劈棺》等片。编剧导演及演员都不考究，而且对艺术上似乎很忽略。至于英美烟公司的电影部，厂设在虹桥路口，机器相当完备，计划相当周密，他们还想将来一手掌握外国片的发行。记得出过一部片子，是在杭州西湖拍的，好象把一个外国童话拍成中国古装故事，女主角是一个公主，身上穿的全是戏装。导演的手法非常幼稚，片子虽长，观者不感兴趣。

这两家电影公司未能发展起来，原因在他们没有艺术人材。后来上海出现了许多电影公司，那些公司又都有相当的编剧、导演、演员等人材，于是他们两家就知难而退，不再干下去了。

连 环 戏

在上海的电影公司很蓬勃的时候，九亩地新舞台忽然出现一种空前的“连环戏”。这是舞台剧与电影互相结合的玩意儿。这是把一部戏一分为二：一部分在银幕上映，一部分在舞台上演。凡舞台上不容易演的，如高山、大川、铁路、轮船以及名胜风景等等背景，都用电影来拍摄；而室内的戏，大部分都在台上表演。这并非电影与舞台剧各演半部，乃是将一部戏分成五六节。设如第一节为电影，则电影的末一镜头映完，顿时电灯一亮，银幕卷起，台上的人就接演下去。演完第二节时，电灯一暗，银幕下垂，第三节的电影又开始了。如此，每一部戏总有五六次交替。这玩意儿，在日本称“连锁剧”，新舞台就译为“连环戏”。这是由徐半梅氏设计的。

新舞台一共演过两部连环戏，第一部是《凌波仙子》，第二部是《红玫瑰》。当时曾轰动一时。不过连环戏有一个大缺点，若是电影拍成后，就无法变更；万一剧中一位重要角色脱离了这剧团，这部连环戏便只好从此不演。因为，如果台上另换一个角色，那末与电影上的角色面貌不同，当然会使观众弄得莫名其妙。就是小而言之，一位重要角色临时请假或者生病，另请一人代戏，也同样会产生问题。

上海最早的女说书

上海在开埠之初就有书场，设在茶馆之中。这些说书先生并非男子，而皆为少女。这些女孩子都来自苏州。苏州怎么会产生这些女说书的呢？

据说，苏州女说书最先都是些盲女，她们会说几部书，就是那些《天雨花》《安邦定国志》之类，其中也有唱词，便抱起琵琶来，唱这么一段。不过那些盲女所说的书，只有这几部，她们都是勉强记忆而成，所以书并不多，而且唱亦平平，调子很简单。还有一个缺点，盲女只会背书，说起来毫无表情，所以听的人不觉得怎么有趣。后来为了补救这盲女的缺点，往往二人搭档，一个盲女，一个非盲女，二人一同弹唱，这样一来，还有些生意。她们的组织往往为母女二人，或者师徒二人，年长者为盲女，年轻者有些姿色，应酬功夫亦好。单独盲女，就没有人爱听。

后来年老的死了，只剩些年轻的，当然不会再去找一个盲女来填补，于是一人单独出堂唱，或者两个非盲女成为双档，生意反而有了起色。

那时到上海来的就是这一班人物，个个都不是盲女，艺极平平，仅能唱些开篇或小调而已。名曰说书，实在都不会说书。

男听客中，很有一些人目的不在听书，不过胡闹而已。书场中可以点唱，于是拣貌美的女子多点几曲，作为捧场。这样成了风气，去听书的，都不过点唱小调，那些女孩子们唱罢下台，便走到点唱的客人面前应酬几句，先谢他多多捧场，然后说："我家住在会乐里几号，有空请过来坐坐。"

于是散了书场，那些听客便照指定的地方寻去。在会乐里觅到了这门牌，见有一块小小牌子，上写"书寓"二字，即是说书先生的寓所。因为既称说书先生，这寓所当然可称书寓了。

踏进去一看，就有人引到房间里坐下来，倒也收拾得很清洁。于是先上一杯茶，再拿出水烟袋来敬烟，闲谈几句，客人们就走了。有的在临走给她们一块钱。这样，唱的日子一多，去玩的人自然也渐渐地多了。

所以那些听客目的不在听唱，不过借书场认得几个女子的寓所。那些说书的女子，其实并没有艺术，也唱不出什么新的玩意儿，结果，她们也无非借书场为见面之所，引几个生客到家里去坐坐罢了。

后来客人一多，有的索性不到书场去弹唱，专在家里接客了。客来敬一杯茶，便称茶围。从客人方面讲，称打茶围。于是范围扩大起来，在书寓中打牌也可以，请酒也可以，这时候，说书先生就已变成妓女了。

这与后起的名副其实的女说书，完全是两回事。

上海的说书业

上海的男说书，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茶馆中大都附设书场。说书先生都来自苏州，全是男子，或说小书，或说大书。小书亦称弹词，必须弹唱，而大书只说不唱，小书皆家庭琐事，而大书则往往为国家大事，甚至两国战争。苏州此业，很早就有一个组织，称光裕社，这是苏州说书的正宗。后来另有一个组织，称润裕社，这是未曾拜光裕社社员为师的人，虽然书艺甚佳，名气很响，总不能充光裕社社员。凡光裕社社员，可以在苏州城内各书场说书；润裕社的人，就办不到。除非在露天说书，或者在茶馆中不搭高台，在平台说书。若要与光裕社享同等权利，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拜一个光裕社中的人为师，叩过了头，作为光裕社社员，在苏州城内，无论哪一老书场，都可以登台表演。但在外码头就没这规矩，苏州乃说书的发源地，所以规矩特别严格。

来自苏州的说书先生，光裕社、润裕社的人都有，随便哪一家书场，都可以登台说书。最初，只有单档，由一人独说，后来流行二人一组，称为拼双档，比较热闹些，而艺人方面亦可以轻松些。不过拼双档，只限于弹词，评话却总是一人独说。唱弹词者，有的老师带徒弟也用拼双档之法，引他出道。

至于女子说书，还是六十年前的事，现在虽然都是唱弹词的，而在六十年前，也有过一个说评话的女子，叫做也是娥，即姚荫梅之母。她曾在大世界说《金台传》，红极一时。此外好象还有。

上海的书场，相当的多，不过每天总是一班老听客。有闲阶级，饭后无事，去消磨一两个钟头，花费不大，所以各书场都能维持下去。

自从上海的游戏场一发达，差不多又添了许多书场，但普通的老书场并不受影响，因为老听客都是附近的人，他们不肯舍近就远，所以游戏场里书场吸收的是另外一班听客。

上海的说书艺人，还有扬州帮，他们都在苏北人集会的地方表演。扬帮说书，只说不唱，属于评话一类。还有一种本地帮，都在露天说书，一手拿一铜钹，一手拿一鼓槌，将铜钹敲着，口中唱着七字句，每唱一句，必敲钹数下，这叫做"刮子书"。只有上海本地人和世居浦东的人爱听。现在称为"沪书"，即浦东说书。

至于北方的大鼓书，在游戏场中也有一二点缀，但爱听者还是北方人居多数。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上海旧话
作者=郑逸梅，徐卓呆编著
页数=132
SS号=10120734
出版日期=